

散文

五月三十日的下午

这是一个闷热的下午，这是一个暴风雨的先驱的闷热的下午！我看见穿着艳冶夏装的太太们，晃着满意的红喷喷大面孔的绅士们；我看见“太太们的乐园”依旧大开着门欢迎它的主顾；我只看见街角上有不多几个短衣人在那里切切议论。

一切都很自然，很满意，很平静，——除了那边切切议论的几个短衣人。

谁肯相信半小时前就在这高耸云霄的“太太们的乐园”旁曾演过空前的悲壮热烈的活剧？有万千“争自由”的旗帜飞舞，有万千“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震荡，有多少勇敢的青年洒他们的热血要把这块灰色的土地染红！谁还记得在这里竟曾向密集的群众开放排枪！谁还记得先进的文明人曾卸下了假面具露一露他们的狠毒丑恶的本相！忘了，一切都忘了；可爱的驯良的大量的市民们绅士们体面商人们早把一切都忘了！

那边路旁不知是什么商铺的门槛旁，斜躺着几块碎玻璃片带着枪伤。我看见一个纤腰长裙金黄头发的妇人踉着那碎玻璃，姗姗地走过，嘴角上还浮出一个浅笑。我又看见一个鬓戴粉红绢花的少女倚在大肚子绅士的臂膊上也踉着那些碎玻璃走过，两人交换一个了解的微笑。

呵！可怜的碎玻璃片呀！可敬的枪弹的牺牲品呀！我向你敬礼！你是今天争自由而死的战士以外唯一的被牺牲者么？争自由的战士呀！你们为了他们而牺牲的，许也只受到他们微微的一笑和这些碎玻璃片一样罢？微笑！恶意的微笑！卑怯的微笑！永不能忘却的微笑！我觉得我是站在荒凉的沙漠里，只有这放大的微笑在我眼前晃；我惘惘然拾取了一片碎玻璃，我吻它，迸出了一句话道：“既然一切医院都拒绝我去向受伤的死的战士敬礼，我就对你——和死者伤者同命运的你，致敬礼罢！”我捧着这碎片狂吻。

忽地有极漂亮的声音在我耳边响道：“他们简直疯了！他们想拚着头颅撞开地狱的铁门么？”我陡的转过身去，我看见一位翘着八字须的先生（许是什么博士罢）正斜着眼睛看我。他，好生面熟；我努力要记起他的姓名来。他又冲着我的面孔说道：“我不是说地狱门不应该打开，我是觉得犯不着撞碎头颅去打开——而况即使拚了头颅未必打得开。难道我们没有别的和平的方法么？而况这很有过激化的嫌疑么？我们是爱和平的民族，总该用文明手段呀。实在最好是祈祷上苍，转移人心于冥冥之中。再不然，我们有的是东方精神文明，区区肉体上的屈辱何必计较——哈，你想不起我是谁么？”

实在抱歉，我听了这一番话，更想不起他是谁了，我只有向他鞠躬，便离开了他。

然而他那番话，还在我耳旁作怪地嗡嗡地响；我又恍惚觉得他的身体放大了，很顽强地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去路；又看见他幻化为数千百，在人丛里乱钻；终于我看见街上熙熙攘攘往来的，都是他的化身了，而张牙舞爪的吃人的怪兽却高踞在他们头上狞笑！突然幻象全消，现出一片真景来：那边站满“华人”的水泥行人道上，跳上一匹马，驮了一个黄发碧眼的武装的人，提着木棍不分皂白乱打。棍子碰着皮肉的回音使我听去好像是：“难道

“太太们的乐园”：原为法国作家左拉以百货商店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名，这里即指大百货商店。

我们没有别的和平的方法么？……我们有的是东方精神文明，区区肉体上的屈辱何必计较！”和平方法呀！这未尝不是一个好名词。可惜对于无条件被人打被人杀的人们不配！挨打挨杀的人们嘴里的和平方法有什么意义？人家不来同你和平，你有什么办法呢？和平方法是势力相等的办交涉时的漂亮话，出之于被打被杀者的嘴里是何等卑怯无耻呀！人家何尝把你当作平等的人。爱谈和平方法的先生们呀，你们脸是黄的，发是黑的，鼻梁是平的，人家看来你总是一个劣等民族，只有人家高兴给你和平，没有你开口要求的份儿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信奉这条教义的谰罕默德的子孙们现在终于又挺起身子了！这才有开口向人家讲和平办法的资格呵！像我们现在呢，也只有一个办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甘心少，也不要多！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两句话不断地在我脑海里回旋；我在人丛里忿怒地推挤，我想找几个人来讨论我的新信仰。忽然疏疏落落的下起雨来了，暮色已经围抱着这都市，街上行人也渐渐稀少了。我转入一条小弄，雨下得更密了。路灯在雨中放着安静的冷光。这还是一个闷热的黄昏，这使我满载着郁怒的心更加烦躁。风挟着细雨吹到我脸上，稍感着些凉快；但是随风送来的一种特别声浪忽地又使我的热血在颞颥部血管里乱跳；这是一阵歌吹声，竹牌声，哗笑声！他们离流血的地点不过百步，距流血的时间不过一小时，竟然歌吹作乐呵！我的心抖了，我开始诅咒这都市，这污秽无耻的都市，这虎狼在上而豕鹿在下的都市！我祈求热血来洗刷这一切的强横暴虐，同时也洗刷这卑贱无耻呀！

雨点更粗更密了，风力也似乎劲了些：这许就是闷热后必然有的暴风雨的先遣队罢？

1925年5月30日夜于上海

（原载1925年6月14日《文学周报》177期）

卖豆腐的哨子

早上醒来的时候，听得卖豆腐的哨子在窗外呜呜地吹。

每次这哨子声引起了我不不少的怅惘。

并不是它那低叹暗泣似的声调在诱发我的漂泊者的乡愁；不是呢，像我这样的 outcast，没有了故乡，也没有了祖国，所谓“乡愁”之类的优雅的情绪，轻易不会兜上我的心头。

也不是它那类乎军笳然而已颇小规模悲壮的颤音，使我联想到另一方面的烟云似的过去；也不是呢，过去的，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早已为现实的严肃和未来的闪光所掩煞所销毁。

所以我这怅惘是难言的。然而每次我听到这呜呜的声音，我总抑不住胸间那股回荡起伏的怅惘的滋味。

昨夜我在夜市上，也感到了同样酸辣的滋味。

每次我到夜市，看见那些用一张席片挡住了潮湿的泥土，就这么着货物和人一同挤在上面，冒着寒风在嚷嚷然叫卖的衣衫褴褛的小贩子，我总是感到了说不出的怅惘的心情。说是在怜悯他们么？我知道怜悯是褻渎的。那么，说是在同情于他们罢？我又觉得太轻。我心底里钦佩他们那种求生存的忠实的手段和态度，然而，亦未始不以为那是太拙笨。我从他们那雄辩似的“夸卖”声中感得了他们的心的哀诉。我仿佛看见他们吁出的热气在天空中凝集为一片灰色的云。

可是他们没有呜呜的哨子。没有这像是闷在瓮中，像是透过了重压而挣扎出来的地下的声音，作为他们的生活的象征。

呜呜的声音震破了冻凝的空气在我窗前过去了。我倾耳静听，我似乎已经从这单调的呜呜中读出了无数文字。

我猛然推开幃子，遥望屋后的天空。我看见了些什么呢？我只看见满天白茫茫的愁雾。

（原载 1929 年 2 月 10 月《小说月报》20 卷 2 号）

雾

雾遮没了正对着后窗的一带山峰。

我还不知道这些山峰叫什么名儿。我来此的第一夜就看见那最高的一座山的顶巅像钻石装成的宝冕似的灯火。那时我的房里还没有电灯，每晚上在暗中默坐，凝望这半空的一片光明，使我记起了儿时所读的童话。实在的呢，这排列得很整齐的依稀分为三层的火球，衬着黑黢黢的山峰的背景，无论如何，是会引起非人间的缥缈的思想的。

但在白天看来，却就平凡得很。并排的五六个山峰，差不多高低，就只最西的一峰戴着一簇房子，其余的仅只有树；中间最大的一峰竟还有濯濯地一大块，像是癞子头上的疮疤。

现在那照例的晨雾把什么都遮没了；就是稍远的电线杆也躲得毫无踪影。

渐渐地太阳光从浓雾中钻出来了。那也是可怜的太阳呢！光是那样的淡弱。随后它也躲开，让白茫茫的浓雾吞噬了一切，包围了大地。

我诅咒这抹煞一切的雾！

我自然也讨厌寒风和冰雪。但和雾比较起来，我是宁愿后者呵！寒风和冰雪的天气能够杀人，但也刺激人们活动起来奋斗。雾，雾呀，只使你苦闷，使你颓唐阑珊，像陷在烂泥淖中，满心想挣扎，可是无从着力呢！

傍午的时候，雾变成了牛毛雨，像帘子似的老是挂在窗前。两三丈以外，便只见一片烟云——依然遮抹一切，只不是雾样的罢了。没有风。门前池中的残荷梗时时忽然急剧地动摇起来，接着便有红鲤鱼的活泼泼的跳跃划破了死一样平静的水面。

我不知道红鲤鱼的轨外行动是不是为了不堪沉闷的压迫？在我呢，既然没有杲杲的太阳，便宁愿有疾风大雨，很不耐这愁雾的后身的牛毛雨老是像帘子一样挂在窗前。

1928年11月14日

（原载1929年2月10日《小说月报》20卷2号）

故乡杂记·半个月印象

天气骤然很暖和，简直可以穿“夹”。乡下人感谢了天公的美意，看看米甕里只剩得几粒，不够一餐粥，就赶快脱下了身上的棉衣，往当铺里送。

在我的故乡，本来有四个当铺；他们的主顾最大多数是乡下人。但现在只剩了一家当铺了。其余的三家，都因连年的营业连“官利都打不到”，就乘着大前年太保阿书部下抢劫了一回的借口，相继关了门了。仅存的一家，本也“无意营业”，但因那东家素来“乐善好施”，加以省里的民政厅长（据说）曾经和他商量“维持农民生计”，所以竟巍然独存。然而今年的情形也只等于“半关门”了。

这就是一幅速写：——

早晨七点钟，街上还是冷清清的时候，那当铺前早已挤满了乡下人，等候开门。这伙人中间，有许多是天还没亮足，就守候在那里了。他们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身上刚剥下来的棉衣，或者预备秋天嫁女儿的几丈土布，再不然——那是绝无仅有的了，去年直到今年卖来卖去总是太亏本因而留下来的半车丝。他们带着的这些东西，已经是他们财产的全部了，不是因为锅里等着米去煮饭，他们未必就肯送进当铺，永远不能再见面。（他们当了以后永远不能取赎，也许就是当铺营业没有利益的一个原因罢？）好不容易等到九点钟光景，当铺开门营业了，这一队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们就拚命的挤轧。当铺到十二点钟就要“停当”，而且即使还没到十二点钟，却已当满了一百二十块钱，那也就要“停当”的；等候当了钱去买米吃的乡下人，因此不能不拚命挤上前。

挤了上去，抖抖索索地接了钱又挤出来的人们就坐在沿街的石阶上喘气，苦着脸。是“运气好”，当得了钱了；然而看着手里的钱，不知是去买什么好。米是顶要紧，然而油也没有了，盐也没有了；盐是不能少的，可是那些黑滋滋像黄沙一样的盐却得五百多钱一斤，比生活程度最高的上海还要贵些。这是“官”盐；乡村里有时也会到贩私盐的小船，那就卖一块钱五斤，还是二十四两的大秤。可是缉私营利害，乡下人这种吃便宜盐的运气，一年内碰不到一两回的。

看了一会儿手里的钱，于是都叹了口气。我听得了这样的对话在那些可怜的焦黄脸中间往来：

“四丈布罢！买棉纱就花了三块光景；当当布，只得两块钱！”

“再多些也只当得两块钱。——两块钱封关！”

“阿土的爷那半车丝，也只喝了两块钱；他们还说不要。”

不要丝呵！把蚕丝看成第二生命的我们家乡的农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这第二生命已经进了鬼门关！他们不知道上海银钱业都对着受抵的大批陈丝陈茧皱眉头，是说“受累不堪”！他们更不知道此次上海的战争更使那些搁浅了的中国丝厂无从通融款项来开车或收买新茧！他们尤其不知道日本丝在纽约抛售，每包合关平银 五百两都不到，而据说中国丝成本少算亦在一千两左右呵！

这一切，他们辛苦饲蚕，把蚕看作比儿子还宝贝的乡下人是不会知道的。他们只知道祖宗以来他们一年的生活费靠着上半年的丝茧和下半年田里的收

关平银：旧中国海关征税时出纳银两所用的衡量标准。每两合 37.7994 克。

成；他们只见镇上人穿着亮晃晃的什么“中山绉”，“明华葛”，他们却不知道这些何尝是用他们辛苦饲养的蚕丝，反是用了外国的人造丝或者是比中国丝廉价的日本丝呀！

遍布于我的故乡四周围，仿佛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的那些茧厂，此刻虽然是因为借驻了兵，没有准备开秤收茧的样子，可是将要永远这样冷关着，不问乡下人卖茧子的梦是做得多么好！

但是我看见这些苦着脸坐在沿街石阶上的乡下人还空托了十足的希望在一个月后的“头蚕”。他们眼前是吃尽当完，差不多吃了早粥就没有夜饭，——如果隔年还省下得二三个南瓜，也就算作一顿，是这样的挣扎，然而他们饿里梦里决不会忘记怎样转弯设法，求“中”求“保”，借这么一二十块钱来作为一个月后的“蚕本”的！他们看着那将近“收蚁”的黑霉霉的“蚕种”，看着桑园里那“桑拳”上一撮一丛绿油油的嫩叶，他们觉得这些就是大洋钱，小角子，铜板；他们会从心窝里漾上一丝笑意来。

我们家有一位常来的“丫姑老爷”，——那女人从前是我的祖母身边的丫头，我想来应该尊他为“丫姑老爷”庶几合式，就是怀着此种希望的。他算是乡下人中间境况较好的了，他是一个向来小康的自耕农，有六七亩稻田和靠廿担的“叶”。他的祖父手里，据说还要“好”；账簿有一叠。他本人又是非常勤俭，不喝酒，不吸烟，连小茶馆也不上。他使用他的田地不让那田地有半个月的空闲。我们家那“丫小姐”，也委实精明能干，粗细都来得。凭这么一对儿，照理该可以兴家立业的了；然而不然，近年来也拖了债了。可不算多，大大小小百十来块罢？他希望在今年的“头蚕”里可以还清这百十来块的债。他向我的婶娘“掇转”二三十元，预备趁这时桑叶还不贵，添买几担叶。（我们那里称这样的“期货叶”为“赊叶”，不过我不大明白是否这个“赊”字。）我觉得他这“希望”是筑在沙滩上的，我劝他还不如待价而沽他自己的二十来担叶，不要自己养蚕。我把养蚕是“危险”的原因都说给他听了，可是他沉默了半晌后，摇着头说道：

“少爷！不养蚕也没有法子想。卖叶呵，廿担叶有四十块卖算是顶好了。一担茧子的“叶本”总要廿担叶，可是去年茧子价钱卖到五十块一担。只要蚕好！到新米收起来，还有半年；我们乡下人去年的米能够吃到立夏边，算是难得的了，不养蚕，下半年吃什么？”

“可是今年茧子价钱不会像去年那样好了！”

我用了确定的语气告诉他。

于是这个老实人不作声了，用他的细眼睛看看我的面扎，又看看地下。

“你是自己的田，去年这里四乡收成也还好，怎么你就只够吃到立夏边呢？而且你又新背了几十块钱债？”

我转换了谈话的题目了。可是我这话刚出口，这老实人的脸色就更加难看，——我猜想他几乎要哭出来。他叹了口气说：

“有是应该还有几担，我早已当了。镇里东西样样都贵了，乡下人田地里种出来的东西却贵不起来，完粮呢，去年又比前年贵，——一年一年加上去。零零碎碎又有许多捐，我是记不清了。我们是拚命省，去年阿大的娘生了个把月病，拚着没有看郎中吃药，——这么着，总算不过欠了几十洋钲新债。今年蚕再不好，那就——”

他顿住了，在养蚕这一项上，乡下人的迷信特别厉害，凡是和蚕有关系的不吉利字面，甚至同音字，他们都忌讳出口的。

我们的谈话就此断了。我给这位“丫姑老爷”算一算，觉得他的自耕农地位未必能够再保持两三年。可是他在村坊里算是最“过得去”的。人家都用了羡慕的眼光望着他：第一，因为他不过欠下百十来块钱债，第二，他的债都是向镇上熟人那里“掇转”来，所以并没花利息。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这位聪明的“丫姑老爷”深懂得“理财”方法，便做一个财政总长好像也干得下：他仗着镇上有几个还能够过得去的熟人，就总是这里那里十元二十元的“掇”，他的期限不长，至多三个月，“掇”了甲的钱去还乙，又“掇”了丙的钱去还甲，这样用了“十个缸九个盖”的方法，他不会到期拖欠，他就能“掇”而不走付利息的“借”那一条路了；可是他的开支却不能不一天一天大，他的进项却没法增加，所以他的债终于也是一年多似一年。他是在慢性的走上破产！也就是聪明的勤俭的小康的自耕农的无可避免的命运了！

后来我听说他的蚕也不好，又加以茧价太贱，他只好自己缫丝了，但是把丝去卖，那就简直没有人要；他拿到当铺里，也不要，结果他算是拿丝进去换出了去年当在那里的米，他赔了利息，可是这掉换的标准是一车丝换出六斗米，照市价还不到六块钱！

东南富饶之区的乡下人生命线的蚕丝，现在是整个儿断了！

然而乡下人间接的负担又在那里一项一项的新加出来。上海虽然已经“停战”，可是为的要“长期抵抗”，向一般小商人征收的“国难捐”就来了。照告示上看，这“国难捐”是各项捐税照加二成，六个月为期。有一个小商人谈起这件事，就哭丧着脸说：

“市面已经冷落得很。小小镇头，旧年年底就倒闭了二十多家铺子。现在又加上这国难捐，我们只好不做生意。”

“国难！要是上海还在那里打仗，这捐也还有个名目！”

又一个人说；我认识这个人，是杂货店的老板。他这铺子，据我所知，至少也有三十年的历史；可是三十年来从他的父亲到他手里，这铺子始终是不死不活，若有若无。现在他本人是老板，他的老婆和母亲就是店员；——不，应该说之所以名为老板，无非因为他是一家中惟一的男子，他并不招呼店里的事情，而且实在亦无须他招呼；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到处跑，把镇上的“新闻”或是轮船埠上客人从外埠带来的新闻，或是长途电话局里所得的外埠新闻，广播台似的告诉他所有的相识者，——他是镇上义务的活动“两脚新闻报”。此外，他还要替几个朋友人家帮衬婚丧素事，甚至于日常家务。他就是这么一位身子空，心肠热的年青人。每天他的表情最严肃的时候，是靠在别家铺子的柜台上借看那隔天的上海报纸。

当时我听了他那句话，我就想到他这匆忙而特别的生活与脾气，我忍不住心里这么想：要是他放在上海，又碰着适当的环境，那他怕不是鼎鼎大名交际博士黄警顽第二！

“能够只收六个月，也就罢了；凶在六个月期满后一定还要延期！”

原先说话的那位小商人表示了让步似的又加这一句。我就问道：

“可是告示上明明说只收六个月？”

“不错，六个月！期限满了以后，我们商会就捏住这句话可以不付。可

黄警顽：1894—1982，字镜寰，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员。在职期间因服务热情周到，有较大社会影响，被誉作“交际博士”。

是他们也有新法子；再来一个新名目，——譬如说‘省难捐’罢，反正我们的‘难’天天有，再多收六个月的二成！捐加了上去，总不会减的，一向如此！”

那小商人又愤愤地说。他是已经过了中年还算过得去的商人，六个月的附捐二成，在他还可以忍痛应付，他的愤愤和悲痛是这附捐将要永远附加。我们那位“两脚新闻报”却始终在那里哗然争论这“国难捐”没有名目。他对我说：

“你说是不是：已经不打东洋人了，还要来抽捐，那不是太岂有此理？”

“还要打呢！刚才县里来了电话，有一师兵要开来，叫商会里预备三件事：住的地方，困的稻草，吃的东西！”

忽然跑来了一个人插进来说。于是“国难捐”的问题就无形搁置，大家都纷纷议论这一师兵开来干什么。难道要守这镇么？不像！镇虽然是五六万人口的大镇，可是既没有工业，也不是商业要区，更不是军事上形胜之地，日本兵如果要来究竟为什么？有人猜那一师兵从江西调来，经过湖州，要开到“前线”去，而这里不过是“过路”罢了。这是最“合理”的解释，汹汹然的人心就平静了几分。

然而军队是一两天内就会到的；三件事——住的地方，困的稻草，吃的东西，必须立刻想法。是一师兵呢，不是玩的。住，还有办法；四乡茧厂和寺庙，都可以借一借；困的稻草，有点勉强了，就是“吃”没有办法。供应一万多人的伙食，就算一天罢，也得几千块钱呀！自从甲子年以来，镇上商会办这供应过路军队酒饭的差使，少说也有十次了；没一次不是说“相烦垫借”，然而没一次不是吃过了揩揩嘴巴就开拔，没有方法去讨。向来“过路”的军队，少者一连人，至多不过一团，一两天的酒饭，商店公摊，照例四家当铺三家钱庄是每家一百，其余十元二十元乃至一元两元不等，这样就应付过去了。但现在当铺只剩一个，钱庄也少了一家（新近倒闭了一家），出钱的主儿是少了，兵却多，可怎么办呢？听说商会讨论到半夜，结果是议定垫付后在“国难捐”项下照扣。他们这一次不肯再额外报效了！

到第二天正午，“两脚新闻报”跑来对我说道：

“气死人呢！总当做是开出去帮助十九路军打东洋人，哪里知道反是前线开下来的。前线兵多，东洋人有闲话，停战会议要弄僵，所以都退到内地来了。这不是笑话？”

听说不是开出去打东洋人，我并不觉得诧异；我所十分敬佩的是镇上的小商人办差的手腕居然非常敏捷，譬如那足够万把人困觉的稻草在一夜之间就办好了。到他们没有了这种咄嗟立办的能力时，光景镇上的老百姓也已流徙过半罢？——我这么想。

又过了一个下午又一夜，县里的电话又来：说是那一师人临时转调海宁，不到我们镇上来了。于是大家都松一口气：不来顶好！

却是因为有了这一番事，商会里对于“国难捐”提出了一个小小的交换条件——不是向县里或省里提出，而是向本镇的区长和公安局长。这条件是：年年照例有的“香市”如果禁止，商界就不缴“国难捐”。

“香市”就是阴历三月初一起，十五日为止的土地庙的“庙会”式的临时市场。乡下人都来烧香，祈神赐福，——蚕好，趁便逛一下。在这香市中，

有各式卖耍货的摊子，各式打拳头变戏法傀儡戏髦儿戏等等；乡下人在此把口袋里的钱花光，就回去准备那辛苦的蚕事了。年年当这“香市”半个月工夫，镇上铺子里的生意也带联热闹。今年为的地方上不太平，所以早就出示禁止，现在商会里却借“国难捐”的题目要求取消禁令，这意思就是：给我们赚几文，我们才能够付捐。换一句话是：我们可生不出钱来，除非在乡下人身上想法。而用“香市”来引诱乡下人多花几文，当然是文明不过的办法。

“香市”举行了，但镇上的商人们还是失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乡下人再没有闲钱来逛香市，他们连日用必需品都只好拚着不用了。

我想：要是今年秋收不好，那么，这镇上的小商人将怎么办哪？他们是时代转变中的不幸者，但他们又是彻头彻尾的封建制度拥护者；虽然他们身受军阀的剥削，钱庄老板的压迫，可是他们惟一的希望就是把身受的剥削都如数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盼望农民有钱就像他们盼望自己一样。然而时代的轮子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向前转，乡镇小商人的破产是不能以年计，只能以月计了！

我觉得他们比之农民更其没有出路。

（原载 1932 年 8 月《现代》1 卷 4 期）

冥屋

小时候在家乡，常常喜欢看东邻的纸扎店糊“阴屋”以及“船，桥，库”一类的东西。那纸扎店的老板戴了阔铜边的老花眼镜，一面工作一面和那些靠在他柜台前捧着水烟袋的闲人谈天说地，那态度是非常潇洒。他用他那熟练的手指头折一根篾，捞一朵浆糊，或是裁一张纸，都是那样从容不迫，很有艺术家的风度。

两天或三天，他糊成一座“阴屋”。那不过三尺见方，两尺高。但是有正厅，有边厢，有楼，有庭园；庭园有花坛，有树木。一切都很精致，很完备。厅里的字画，他都请教了镇上的画师和书家。这实在算得一件“艺术品”了。手工业生产制度下的“艺术品”！

它的代价是一块几毛钱。

去年十月间，有一家亲戚的老太太“还寿经”。我去“拜揖”，盘桓了差不多一整天。我于是看见了大都市上海的纸扎店用了怎样的方法糊“阴屋”以及“船，桥，库”了！亲戚家所定的这些“冥器”，共值洋四百余元；“那是多么繁重的工作！”——我心里这么想。可是这么大的工程还得当天现做，当天现烧。并且离烧化前四小时，工程方才开始。女眷们惊讶那纸扎店怎么赶得及，然而事实上恰恰赶及那预定的烧化时间。纸扎店老板的精密估计很可以佩服。

我是看着这工程开始，看着它完成；用了和儿时同样的兴味看着。

这仍然是手工业，是手艺，毫不假用机械；可是那工程的进行，在组织上，方法上，都是道地的现代工业化！结果，这是商品；四百余元的代价！

工程就在做佛事的那个佛寺的院子里开始。动员了大小十来个人，作战似的三小时的紧张！“船”是和我们镇上河里的船一样大，“桥”也和镇上的小桥差不多，“阴屋”简直是上海式的三楼三底，不过没有那么高。这样的大工程，从扎架到装璜，一气呵成，三小时的紧张！什么都是当场现做，除了“阴屋”里的纸糊家具和摆设。十来个人的总动员有精密的分工，紧张连系的动作，比起我在儿时所见那故乡的纸扎店老板捞一朵浆糊，谈一句闲天，那种悠游从容的态度来，当真有天壤之差！“艺术制作”的兴趣，当然没有了；这十几位上海式的“阴屋”工程师只是机械地制作着。一忽儿以后，所有这些船，桥，库，阴屋，都烧化了；而曾以三小时的作战精神制成了它们的“工程师”，仍旧用了同样的作战的紧张帮忙着烧化。

和这些同时烧化的，据说还有半张冥土的房契（留下的半张要到将来那时候再烧）。

时代的印痕也烙在这些封建的迷信的仪式上。

1932年11月8日

（原载1932年12月16日《东方杂志》29卷8号）

还寿经：为了表示儿子的孝心，在父母寿辰时（大概是五十以后逢十的寿辰）请和尚念经，叫做“还寿经”，这是嘉兴、湖州一带的风俗。——作者注

光明到来的时候

—

“朋友！这，这是什么哟！我好像看见一点什么了！红的，绿的，黄的，小小的，圆圆的，尖角的，在那里跳！跳！”

“可是我并没有看见。你在那里做梦！”

“不是梦！你说，怎么会是梦呢？我咬我的指头，我觉得痛！朋友，这又来了：红的，绿的，小小的，在那里飘浮，在那里跳跃！”

“那么，一定是你的眼花！我们小时候一闭了眼睛就会看见一些眼花；五彩的光圈，五彩的线条，旋转，舞蹈！我们做了大人以后就没有这些眼花了。你比我年青些，也许你还有——”

“年青些？哈哈！”

“笑什么！你还能够笑？”

“呵呵，我笑了么？因为我又看见那些小小的活跃的东西了！红的，绿的！这回比刚才更加多了！一点也不含糊，更加多了！更加活跃！”

“全是梦话，全是幻想！你还有心情说梦话，唉！”

“当真你一点也不见么？这是可怜的！朋友，你到我这边来，就看见了！朋友，这是我的手。你扶着我的手过来罢！朋友，当心跌交！脚底下有坑！朋友！这是我的手，我的臂膊！你的呢？你的呢？”

“你的手多么热呀！”

“我全身的血都沸滚了哟！你想想，一向是无穷无尽的黑暗，坟墓一样，而现在我看见了有一些活跃的东西，彩色的东西了！……喔唷唷！你踩了我的脚！哎！这毛茸茸的就是你的头么？哈哈，你抱住了我么？我们紧紧地抱着罢！……现在，你看，这不是么？红的，绿的！呵呵！”

“可是我眼前仍旧一片黑暗，黑暗！”

“这就怪了！——哦，不要动！是我的手哟，你不要怕！这是你的脸么？这么着，不要动！你朝前看呀！朝前看呀！”

“哈哈，我也看见了！当真！”

“可不是红的，绿的，蚊子一样的，在那里飞舞么？”

“是呀！像一支军队，它们跳跃着拥上前来呀！呵呵，它们像从天上来！它们排成一直线来，没有一点弯曲！多么美丽！多么活跃！多么勇敢呀！”

“而且它们不退缩！往前冲，往前冲！哈哈！二个碰在一处了！变成大一些的一个了！又分开了！仍然往前冲，往前冲！喂，朋友，你猜来这是什么？……怎么你不说话？你睡着了么？嘿！你会在这些美丽的活跃的现象面前睡觉！”

“胡说！我在这里想，我在这里想呀！”

“又是想了！空想家！”

“不要吵！我在这里研究呀！”

“又是研究了；研究系！”

“不要吵，行么？这是一个现象，总得研究！我要研究它是不是我们那视官的幻觉！是不是就像我们小时候那眼花，我要研究它！我们不能随便轻信，随便盲动，随便上当！”

“你这怀疑派！难道你觉得那黑暗还不够久长么？”

“不要吵！研究出来了：这是一道光！”

“一道光！哦？”

“不错，一道光！穿破了这黑暗的一道光！外边天亮了，而我们这黑暗的古老的建筑也有了裂缝了！”

“有了裂缝么？”

“是呀！这古老的坚牢的坟墓早已应该崩坍，早已有了裂缝，而现在，外边的光明钻进这裂缝来了！”

“哈哈！”

“哈哈！你还讥笑研究的态度么？”

“可是光知道了有什么用？”

“知道了就会发生行动！智慧产生信仰，信仰产生力量！”

“呵呵，那么我们来罢！我们打破这牢狱！打破这黑暗的笼！这是我的手，我的拳头！你的呢，你的呢？哦——在这里了！我们打呀！我们冲呀！好呀！蓬蓬！朋友，再用力！蓬蓬！呀！你怎么？”

“我的手痛了！喔唷唷！腻忒忒的东西！我相信那就是血！我已经受伤！”

“咄！你一说，当真我也觉得有点儿痛！我这也是血罢！然而朋友，不要畏缩，不要灰心！你想想，外边已经天亮，而且光明像一支枪，像一支尖头的槲，已经打进了我们这黑暗的笼！”

“对呀！那么一条细光就已经很美丽，外边的全是光明的世界不知道美丽到怎样了！呀呀！我想着了就快活到全身发抖！”

“可是我痛得全身发抖！一点力都没有了！这黑暗的笼还是很坚固！呀！红的绿的更加多了！它们跳跃，跳跃！”

“我也是一点力都没有了！可是我们的力量本不在拳头而在头脑！”

“现在却需要拳头！”

“可是我要休息一下。那裂缝总是愈裂愈大，我们且等待一下，到时机成熟再动手罢！呀呀！多么美丽，这一道光！然而还只得指头粗细那么一道！”

“哎！我手脚都软了！不知道是为此的疲倦呢，还是为的快乐！我也只好歇一下。朋友，你不想大声叫一下么？我们大声叫呀！多么美丽！光明在前面不远了！朋友，我们拥抱罢！我们要唱一支歌，欢迎光明的来到！”

二

“不知道又经过多少时候了。怎么还没听得外边有响动！我闷得慌！”

“可不是！我的心头就像有许多蚂蚁历历落落的在那里爬！想到外边的世界已经放光明，我就觉得这里的黑暗更加不可耐了！先前怎么会忍耐得下去，想来真奇怪！”

“然而你不要性急，馒头已经吃到豆沙边了！你看！一道道的光，更加多了！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了！哈哈，这光线的网！多么美丽，是奇观呀！你看！这些光线都比刚才又粗了些了！喂喂，你把你的脸放到那条顶粗的光线里让我看一看罢！我们好久没有看见你我的脸了！也许我们彼此要不认得了！现在，再移近些！喔呵！我看见了，看清楚了！你的脸多么苍白！就同死人一样！哎，你试笑一笑！多久我没有看见人们的笑容了！呸！你这笑不自然，不美丽！可怜的孩子，你连怎样笑都忘记了罢？你这怪丑恶的笑脸怎么好到外边那光明的世界！你用这样的笑脸去欢迎光明，那是天大的罪

过呀！”

“可是你呢？你也把脸放到这顶粗的光线里让我看一看罢！你会比我好些么！来，来，来！这里！这里！这里……”

“我相信我还不至于十分走样！”

“咄！别吹牛！哈哈，你还像个人么！满脸的胡子了！还有，——你别动！你不要逃，你有一对红镶边的眼睛！你简直像个猴子！”

“胡说！”

“可惜没有一面镜子给你自己照一照！”

“这也用得到大惊小怪么？经过了那么多的苦难，人总不免有点走样！我比你年纪大些，经过的苦难比你多，可是我的经验也就比你丰富了！哎！先前我们那一伙，最早的寻求光明的同志，现在只剩了我一个，怎么我能够不老呀！”

“就是我一辈子，也只剩了个我！前些时还听得他们在那边坑里呻吟，现在好久没听到，想来都死了！咄，这杀人的黑暗！可是也快完结了！”

“对了！那个坑！那个杀人的坑！我比你早出世，那时候，这里还没有现在那么黑暗，我看见过那坑的险恶！坑边是刀山，坑底是成万的毒蛇！——呵！你看呀！这一条光恰就射到那坑边上了！那白森森的就是枯骨，那一闪一闪发着红光的的就是毒蛇的眼睛罢！呵！你再跟着那一道光看过去哟！那是什么？哦哦，那是吊人的木架子，那是砍头的大刀罢！呀呀，我现在又看见了这一切，再要我多住一刻当真不行！”

“可不是！看见的危险比不看见的更加可怕！我的心突突地跳！我怕它会一下里爆裂了！朋友，不要再朝下边看了。我们朝上面看罢！不要回忆那些过去的，我们想想那未来的罢！朋友，你总该知道外边的光明世界是怎么一个景象？”

“咳，可怜的孩子，你真是太幼稚了！”

“可是也不能怪我！刚刚我懂一点事！黑暗就包围了我！况且书本子早就被他们烧光了，严密的文化封锁！”

“哦哦，不错，那么，让我来想一想。哦，书本子上说——”

“怎么！你也只是书本子上看来的么？”

“咦！不晓得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孩子！除了书本子，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根据呀！喂！我记得书本子上说过——总而言之，是一个全善全美的世界，乐园，天堂！”

“说下去呀！我等着你再说下去呀！你说得具体一点儿，不要太抽象！”

“真是麻烦的孩子！那么，你听着！喂，从哪儿说起呢？一部二十四史！呵，有了，你用心听着！大概是什么神话上说过，从前世界上有一个黄金时代，那时候，人类不分你我，共同生活，没有贪鄙奸诈；面包生在树上，河里就是牛奶；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平等，自由，幸福！处处是琼楼贝阙，鸟语花香！这样的黄金时代，古已有之，而现在回来了，就是那外边的光明世界。”

“啧啧！那才是人的生活！就在外边么？我不耐烦了！”

“呵！你要耐烦点！不是已经试过了么，我们的拳头不中用！”

“可是我现在全都知道了，我就耐不住；我想我一定得闷出病来罢。”

“嘻嘻，快了！你不看见这里纵横四射全是一道一道的光么？哈！又多了几条了，五条，六条，七条！哈，这黑暗的老屋子全是些裂罅了！快了！”

“哈！不要响！那是什么声音？听得么？听得么！”

“呵，当真！那好像是风罢，呼——呼——的！”

“而且那轰隆隆的，一定是雷！呵，风！雷！”

“而且还有雨呢！你听！那一片擂鼓似的声音！”

“这是少有的大风雷雨！我的耳朵也震聋了！”

“我们说话也听不清了！呵，这是翻天覆地的大风雷雨！等我想一想：历史上说的洪水时期也许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喂！喂！你说的什么红，红？我一点也听不清楚！”

“不好了！地在我们脚底下震动！我想这是火山爆发！呵！这一声！”

“呵！地震！雷吼！我还看见了电火！”

“呵——喔——……”

“怎么！你发疯？你扑在地下干什么？呀呀！看那边，那边！一派亮光！一派火！我们右边没有那牢墙了！哈哈！自由！光明！可是，咦，怎么的，我的眼睛——”

“让我来看！火，火，火！啊哟！哪里来的针刺了我的眼睛！”

“天哪！怎么我睁不开眼睛！我要去欢迎光明呀，怎么我的眼睛——”

“而且我也是一样的病！”

“你说，快说！什么病？啊哟！风吹得我全身发抖！有什么东西烫着我的皮肤！而且我的眼睛还是痛，很痛！”

“呃……”

“怎么！这是你么？你抱住了我干什么？你拖我走？你拉我到哪里去呀？天哪！我的眼睛！我怕是盲了不成！……你拖我到哪里去呀？你，你，你！……”

三

“现在没有声音了。”

“那蓬蓬地响着的又是什么？”

“那光景就是大火！烧毁了一切的大火！”

“也要烧到我们这里来罢？”

“光景是要来的！”

“那么我要去看一看，我要离开这半黑暗的该诅咒的墙角！”

“但是你不怕那边太强烈的光线刺痛了你的眼睛么？”

“我不怕！就是瞎了眼睛，我也要去！为了寻求光明，即使瞎了眼睛也值得！”

“但是那边并不是真的光明！那边的是地狱里喷发出来的孽火！那边一点也不像我从前所读的书本子上那些话！”

“你难道能够断定你的书本子一定不错！书本子是死的，书本子不能预言了一切变化！我一定要走了！你也一块儿去罢！”

“你的眼睛就能够睁开来么？我的是不行！在这里，我还觉得眼皮上麻辣地有点刺痛！”

“我也有一点儿。但是我想来那是一定不可免的过程。你想想我们在黑暗中多久了，骤然跑到强烈的光明下，眼睛总要睁不开！总要觉得痛！忍过这一会儿就好了！”

“可是我不愿意。并且我读过的书本子只许给我自由，快乐，没有说过先得受痛苦！先要给人痛苦的，那就不是理想的极乐世界！”

“那么我一个人走了！”

“不行！你不能一个人走！你一定要年长的人给你引路！”

“我不要谁来引路！我会走自己的路！”

“但是你丢我一个人在这里未免太残酷！”

“那我没有别的办法。”

“你竟说没有别的办法？”

“那有什么办法呢？”

“但是你最好再等一下。那边的大火会把你烧做灰！”

“我就想到大火里去锻炼一下。”

“你这是不知高低的话！”

“哈，哈，哈！……呵，雷又响了！这风！呀，呀，朋友，快走，快走！这墙也要倒下来了！我扶着你罢！呀——”

“哼，哼，可是我当真不行了！……我的心好像已经爆破了，我的眼睛也盲了！……这变动！天翻地覆的变动！我相信这一定不是好的正气的变动！……书本上从没说过……我当真不行了！我不能动了！我快就要死了！”

“但是朋友，你得努力，你得振作！我抱你起来罢？”

“不成！……”

“呀呀！你的脸，你的嘴唇，全都冷下去了，冷下去了！让我来试一试看，还有没有气息？呀——可是，这墙当真就要倒了！火，火也就要烧过来了！哈！来罢！烧毁了旧世界的一切渣滓！来罢！我要在火里洗一个澡！”

1932年11月26日

（原载1933年1月1日《中学生》32期）

上海大年夜

在上海混了十多年，总没见识过阴历大年夜的上海风光。什么缘故，我自己也想不起来了；大概不外乎“天下雨”，“人懒”，“事忙”：这三桩。

去年，——民国二十二年，岁在癸酉，公历一千九百三十三年，恰逢到我“有闲”而又“天好”，而又是小病了一星期后想走动，于是在“大年夜”的前三天就时常说“今年一定要出去看看了”。

天气是上好的。自从十八日（当然是废历）夜里落过几点雨，一直就晴了下来。是所谓“废历”的十八日，我担保不会弄错。因为就在这一天，我到亲戚家里去“吃年夜饭”。这天很暖和，我料不到亲戚家里还开着“水汀”，毫无准备的就去了，结果是脱下皮袍尚且满头大汗。当时有一位乡亲对我说：“天气太暖和了，冬行春令，——春令！总得下一场腊雪才好！”

似乎天从人愿，第二天当真冷了些。可是这以后，每天一个好太阳把这“上海市”晒得一天暖似一天；到废历的“大年夜”的“前夕”，简直是“上坟时节”的气候了。

而这几天里，公债库券的市价也在天天涨上去，正和寒暑表的水银柱一般。

“大年夜”那天的上午，听得生意场中一个朋友说：“南京路的商店，至少有四五十家过不了年关，单是房租，就欠了半年多，房东方面要求巡捕房发封，还没解决。”

“这就是报纸上常见的所谓‘市面衰落’那一句的实例么？”我心里这样想。然而翻开“停刊期内”各报的“号外”来看，只有满幅的电影院大广告搜尽了所有的夸大，刺激，诱惑的字眼在那里斗法。

从前见过店铺倒闭的景象也在我眼前闪了一闪。肩挨着肩的商店的行列中忽然有一家紧闭着栅门，就像那多眼的大街上瞎了一只眼；小红纸写着八个字的，是“清理账目，暂停营业”；密密麻麻横七竖八贴满了的，是客户的“飞票”；而最最触目的是地方官厅的封条，——一个很大的横十字。

难道繁华的南京路上就将出现四五十只这么怪相的瞎眼？于是我更加觉得应该去看看“大年夜”的上海。

晚上九点钟，我们一行五个人出发了。天气可真是“理想的”。虽然天快黑的时候落过几点牛毛雨，此时可就连风也没有，不怕冷的人简直可以穿夹。

刚刚走出弄堂门，三四辆人力车就包围了来，每个车夫都像老主顾似的把车杠一放，拍了拍车上坐垫，乱嚷着“这里来呀！”我们倒犹豫起来了。我们本来不打算坐人力车。可是人力车的后备队又早闻声来了，又是三四辆飞到了我们跟前。而且似乎每一个暗角里都有人力车埋伏着，都在急急出动了。人力车的圆阵老老实实在我们一行五个包围了！

“先坐了黄包车，穿过××街，到××路口再坐电车，怎样？”

我向同伴们提议了。

“××路口么？一只八开！”车夫之一说。

“两百钱！”我们一面说，一面准备“突围”。

“水汀”：英语 steam 的音译，即暖气。

一只八开：上海话，一角银毫。

“一只八开！年三十，马马虎虎罢。”

这是所谓“情商”的口吻了。而且双方的距离不过三四个铜子。于是在双方的“马马虎虎”的声音中，坐的坐上，拉的也就开步。

拉我的那个车夫例外地不是江北口音。他一面跑，一面说道：

“年景不好……往年的大年夜，你要雇车也雇不到。……哪里会像今年那样转弯角上总有几部空车子等生意呢。”

说着就到了个转角，我留神细看，果然有几辆空车子，车夫们都伸长了“觅食”的颈脖。

“往年年底一天做多少生意？”我大声问了。其实我很不必大声。因为这条××街的进口冷清清的并没为的是“大年夜”而特别热闹。

“哦——打仗的上一年么？随便拉拉，也有个块把钱进账……”

“那么，今年呢？”

“运气好，还有块把钱；不好，五六毛。……五六毛钱，派什么用场？……你看，年底了，洋价倒涨到二千八百呀！”

“哦——”我应了这么一声，眼看着路旁的一家烟兑店，心里却想起邻舍的×太太来了。这位太太万事都精明，一个月前，洋价二千七的时候，她就兑进了大批的铜子，因为经验告诉她，每逢年底，洋价一定要缩；可是今年她这小小的“投机事业”失败了，今天早上我还听得她在那里骂烟兑店“混账”。

“年景不好！”拉我的车夫又叹气似的说：“一天拉五六毛，净剩下来一双空手，过年东西只好一点也不买。……不像是过年了！”××路已经在前面了。我们一行五人的当先第一辆车已经停下来了。我付钱的时候，留神看了看拉我的那车夫一眼。他是二十多岁精壮的小伙子，并不是那些拉不动的“老枪”，然而他在这年底一天也只拉得五六毛钱么？

站在××路口，我又回望那短短的××街。一家剃头店似乎生意还好。我立刻想到我已经有二十多天没曾理发。可是我的眼光随即被剃头店间壁的南货店吸住了。天哪，“大年夜”南货店不出生意，真怪！然而也不足怪。像这样小小的南货店，自然只能伺候中下级社会的主顾，可是刚才拉我的车夫不是说“过年东西只好一点也不买”么？

“总而言之，××街里没有大年夜。”

坐在电车里，我这样想。同时我又盼望“大年夜”是在南京路、福州路一带。

十字路口，电车停住了。交通灯的红光射在我们脸上。这里不是站头，然而电车例外的停得很长久。

“一部汽车，两部汽车，……电车，三部汽车，四部，五部，……”

我身边的两个孩子，脸贴在车窗玻璃上，这样数着横在前面的马路上经过的车辆。

我也转脸望着窗外，然而交通灯光转了绿色，我们坐的电车动了。哦！哦！从我们的电车身边有一辆汽车“突进”了，接着又是一辆，接着是一串，威风凛凛地追逐前进，我们的电车落后了。我凝眸远眺。前面半空中是三公司大厦高塔上的霓虹电光，是戳破了黑暗天空的三个尖角，而那长蛇形的汽车阵，正向那尖角里钻。然而这样的景象只保留了一刹那。三公司大厦渐近。血管一样的霓虹电管把那庞大建筑的轮廓描画出来了。

“你数清么？几部？”

孩子的声音在我耳边响了起来。这不是问我，然而我转眼看着这两个争论中的孩子了。忽然有一条原则被我发见了：今夜所见坐车的人好像只有两个阶级，不是挤在电车或公共汽车里，就是舒舒服服坐了黑牌或白牌的汽车，很少人力车！也许不独今夜如此罢？在“车”字门中，这个中间的小布尔乔亚气味的人力车的命运大概是向着没落的罢？

我们在南京路浙江路口下了电车。

于是在“水门汀”上，红色的自来水龙头旁边，我们开了小小的会议。

“到哪里去好？四马路怎样？”

这是两位太太的提议。她们要到四马路的目的是看野鸡；因为好像听得一位老上海说过，“大年夜”里，妓女们都装扮了陈列在马路口。至于四马路之必有野鸡，而且其数很多，却是太太们从小在乡下听熟了的。

可是两个孩子却坚持要去看电影。

这当儿，我的一票可以决定局势。我主张先看电影后看野鸡。因为电影院“大年夜”最后一次的开映是十一点钟。看过了电影大概四马路之类还有野鸡。

于是我们就走贵州路，打算到新光大戏院去。

我不能不说所谓“大年夜”者也许就在这条短短的狭狭的贵州路上；而且以后觉得确是在这里。人是拥挤的，有戴了鸭舌头帽子的男人，更有许多穿着绯色的廉价人造丝织品的年青女子；也有汽车开过，慢慢地爬似的，嗞嗞地好像哀求。两个孩子拖着我快跑，（恐怕赶不上影戏，）可是两位太太只在后边叫“慢走”。原来她们发见了这条路上走的或是站着的浓妆年青女子就是野鸡。

也许是。因为鸭舌头帽子的男人掷了许多的“攒炮”，拍拍拍地都在那些浓妆的青年女子的脚边响出来，而她们并不生气。不但不生气，还是欢迎的。“愈响愈发”：是她们的迷信。

我们终于到了新光大戏院的门口。上一场还没散，戏院门里门外挤满了人。

而且这些人大都手里有票子。

两位太太站在马路旁边望着那戏院门口皱眉头。就是那勇敢的男孩子，（他在学校里“打强盗山”是出名勇敢的，）也把疑问的眼光看着我的面孔。

“就近还有几家影戏院，也许不很挤。”

我这样说着，征求伙伴们的同意。

但是假使片子不好呢？大些的孩子，一个很像大人的女孩子，眼光里有了这样的迟疑。“不管它！反正我们是来趁热闹的。借电影院坐坐，混到一点多钟，好到泥城桥一带去看兜喜神方的时髦女人。”

又是我的意见。然而两个孩子大大反对。不过这一回，他们是少数了，而且他们又怕多延捱了时间，“两头勿着实”，于是只好跟着我走。

到了北京大戏院。照样密密的人层。而且似乎比新光大戏院的现象更加汹汹然可畏。转到那新开幕的金城。隔着马路一望，我们中间那位男孩子先叫起“好了”来了。走到戏院门口，我们都忍不住一股的高兴。这戏院还是“平时状态”。但是，一问，可糟了！原来这金城大戏院没有“大年夜”的，夜戏就只九点半那一场，此时已经闭幕。

看表上是十一点差十分。

“到哪里去好呢？”——大家脸上又是这个问号了。也许新光今夜最后

一场是十一点半开映罢？那么，还赶得及。新光近！

真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定要看影戏。孩子们是当真要看的，而我们三个大人呢，还是想借此混过一两个钟点，预备看看“大年夜”的上海后半夜的风光而已。

然而又到了新光了。十一点正，前场还没散，门里门外依然挤满了人，也许多了些。这次我们是奋勇进攻了。五个人是一个长蛇阵。好容易挤了进去，望得见卖票处了，忽然又有些绅士太太们却往外边挤；一面喊道：“票子卖完了。卖完了！”我疑心这是骗人的。为什么戏院当局不挂“客满”的牌子？我不能再“绅士气”了。我挤开了几位拦路的时髦女郎，直到卖票处前面，我们的长蛇阵也中断了。卖票员只对我摇手。

好容易又挤了出来，到得马路上时，我忍不住叹口气说：

“虽然‘大年夜’不在××街的小小南货店里，可确是在每家影戏院里！”

以后我们的行程是四马路了。意外地不是“大年夜”样的，也没看见多少艳妆的野鸡之类。“攒炮”声音更少。

两个孩子是非常扫兴了。于是“打吗啡针”：每人三个汽球。

我们最后的希望是看看南京路上有没有封皮的怪相“瞎眼睛”。

然而也没有。

十二点光景挤进了南京路的虹庙。这是我的主张。可是逛过了浴佛节的静安寺的两个孩子大大不满意。“没有静安寺那样大”，是他们的批评。他们怎么会知道我是出来找“大年夜”的，而“大年夜”确也是在这座庙里！

后来我知道过不了年关的商店有五百多家。债权人请法院去封门。要是一封，那未免有碍“大上海”的观瞻，所以法院倒做了和事老。然而调解也等不及，干脆关上大门贴出“清理账目”的铺子也就有二百几十家了。南京路上有一家六十多年的老店也是其中之一。

“你猜猜，南京路的铺子有几家是赚钱的？——哈哈，说是只有两家半！那两家是三阳南货店和五芳斋糕团点心店。那半家呢，听说是冠生园。”

回家的路上碰见一位乡亲，他这样对我说。

乡亲这番话，我怎么能够不相信？并且我敢断定复杂的“大上海”市面无论怎样“不景气”，但有几项生意是不受影响的，例如我们刚去随喜了来的虹庙。并且我又确实知道沪西某大佛寺的大小厅堂乃至“方丈室”早已被施主们排日定完；这半年里头，想在那大佛寺里“做道场”，简直非有大面子不行的！

到家的时候，里内一个广东人家正放鞭炮，那是很长的一串，挑在竹竿上。我们站在里门口看去，只见一条火龙，渐缩渐短。等放过了我们走进去，依旧是冷清清的弄堂，不过满地碎红，堆得有寸许厚。

1934年2月28日

（原载1934年4月1日《文学季刊》2期）

我曾经穿过怎样的紧鞋子

我在小学校的时候，最喜欢绘画。教我们绘画的先生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国画家。他的专门本领是画“尊容”，我的曾祖的《行乐图》就是他画的，大家都说像得很。他教我们临摹《芥子园画谱》，于是我们都买了一部石印的《芥子园画谱》。他说：“临完了一部《芥子园画谱》，不论是梅兰竹菊，山水，翎鸟，全有了门径。”

他从不自己动手画，他只批改我们的画稿；他认为不对的地方，就赏一红杠，大书“再临一次”。

后来进了中学校，那里的图画教师也是国画家，年纪也有点老了。不过他并不是“尊容专家”。他的教授法就不同了。他上课的时候在黑板上先画了一幅，一面画，一面叫我们跟着临摹；他说：“画画儿最要紧的诀窍是用笔的先后，所以我要当场一笔一笔现画，要你们跟着一笔一笔现临；记好我落笔的先后哪！”有时他特别“卖力”，画好了那幅“示范”的画儿以后，还拣那中间的困难点出来，在黑板的一角另画一幅“放大”，好比影片中的“特写”。

这位先生真是又和气又热心，我到现在还想念他。不用说，他从前大概也曾在《芥子园画谱》之类用过苦功，但他居然不把《芥子园画谱》原封不动挪给我们，却换着花样来教我们，在那时候已经十分难得了。

然而那时候我对于绘画的热心比起小学校时代来，却差得多了。原因大概很多，而最大的原因是忙于看小说。课余时间全部消费在旧小说上头，绘画不过在上课的时候应个景儿罢了。

国文教师称赞我的文思开展，但又不满意地说：“有点小说调子，应该力戒！”这位国文教师是“孝廉公”，又是我的“父执”，他对于我好像很关切似的，他知道我的看小说是家里大人允许的，他就对我说：“你的老人家这个主张，我就不以为然。看看小说，原也使得，小说中也有好文章，不过总得等到你的文章立定了格局，然后再看小说，就没有流弊了。”过一会儿，他又摸着下巴说：“多读读《庄子》和韩文罢！”

我那时自然很尊重这位老师的意见，但是小学校时代专临《芥子园画谱》那样的滋味又回来了。从前临《芥子园画谱》的时候，开头个把月倒还兴味不差，——先生只叫我临摹某一幅，而我却把那画谱从头到底看了一遍，“欣然若有所得”；后来一部画谱看厌了，先生还是指定了那几幅叫我“再临一次”。又一次，我就感到异常乏味了。而这位老画师的用意却也和那位“孝廉公”的国文教师一样：要我先立定了格局！《庄子》之类，自然远不及小说来得有趣，但假使当时有人指定了某小说要我读，而且一定要读到我“立定了格局”，我想我对于小说也要厌恶了罢？再者，多看了小说，就不知不觉间会沾上“小说调子”，但假使指定了要我去临摹某一部小说的“调子”，恐怕看小说也将成为苦事了罢？

不过从前的老先生就要人穿这样的“紧鞋子”。幸而不久就来了“辛亥革命”，老先生们喟然于“世变”之巨，也就一切都“看穿”些，于是我也不再逢到好意的指导叫我穿那种“紧鞋子”了。说起来，这也未始不是“革命”之赐。

(原载 1934 年 7 月《文学》周年纪念特辑)

交易所速写

门前的马路并不宽阔。两部汽车勉强能够并排过去。门面也不见得怎么雄伟。说是不见得怎么雄伟，为的想起了爱多亚路那纱布交易所大门前二十多步高的石级。自然，在这“香粉弄”一带，它已经是唯一体面的大建筑了。我这里说的是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新屋。

直望进去，一条颇长的甬道，两列四根的大石柱阻住了视线。再进一步就是“市场”了。跟大戏院的池子仿佛。后方上面就是会叫许多人笑也叫许多人哭的“拍板台”。

正在午前十一时，紧急关头，拍到了“二十关”。池子里活像是一个蜂房。请你不要想像这所谓池子的也有一排一排的椅子，跟大戏院的池子似的。这里是一个小凳子也不会有，人全站着，外圈是来看市面准备买或卖的——你不妨说他们大半是小本钱的“散户”，自然也有不少“抢帽子”的。他们不是那吵闹得耳朵痛的数目字潮声的主使。他们有些是仰起了头，朝台上看，——请你不要误会，那卷起袖子直到肩胛边的拍板人并没有什么好看，而且也不会看出什么道理来的；他们是看着台后像“背景”似的显出“××××库券”，“×月期”……之类的“戏目”（姑且拿“戏目”作个比方罢），特别是这“戏目”上面那时时变动的电光记数牌。这高高在上小小的嵌在台后墙上的横长方形，时时刻刻跳动着红字的阿拉伯数目字，一并排四个，两个是单位“元”以下，像我们在普通账单上常常看见的式子，这两个小数下边有一条横线，红色，字体可也不小，因而在池子里各处都可以看得明明白白。这小小的红色电光的数目字是人们创造，是人们使它刻刻在变，但是它掌握着人们的“命运”。

不——应当说是少数人创造那红色电光的记录，使它刻刻在变，使它成为较多数人的不可测的“命运”。谁是那较多数呢？提心吊胆望着它的人们，池子外圈的人们自然是，——而他们同时也是这魔法的红色电光记录的助成者，虽然是盲目的助成者；可是在他们以外还有更多的没有来亲眼看着自己的“命运”升沉的人们，他们住在上海各处，在中国各处，然而这里台上的红色电光的一跳，会决定了他们的破产或者发财。

被外圈的人们包在中央的，这才是那吵得耳朵痛的数目字潮声的发动器。很大的圆形水泥矮栏，像一张极大的圆桌面似的，将他们范围成一个人圈。他们是许多经纪人手下做交易的，他们的手和嘴牵动着台上墙头那红色电光数目字的变化。然而他们跟那红色电光一样，本身不过是一种器械，使用他们的人——经纪人，或者正交叉着两臂站在近旁，或者正在和人咬耳朵。忽然有个伙计匆匆跑来，于是那经纪人就赶紧跑到池子外他的小房间去听电话了，他挂上了听筒再跑到池子里，说不定那红色电光就会有一次新的跳动，所有池子里外圈的人们会有一次新的紧张——掌不住要笑的，咬紧牙关眼泪往肚子里吞的，谁知道呢，便是那位经纪人在接电话以前也是不知道的。他也是程度上稍稍不同的一种器械罢了。

池子外边的两旁，——上面是像戏院里“包厢”似的月楼，摆着一些长椅子，这些椅子似乎从来不会被同一屈服坐上一刻钟或二十分的，然而亦似乎不会从来没有一个人光顾，做了半天冷板凳的。这边，有两位咬着耳朵密谈；那边，又是两位在压低了嗓子争论什么。靠柱子边的一张椅子上有一位弓着背抱了头，似乎转着念头：跳黄浦呢，吞生鸦片烟？那边又有一位，——坐

在望得见那魔法的红色电光记录牌的所在，手拿着小本子和铅笔，用心地记录着，像画“宝路”似的，他相信公债的涨落也有一定的“路”的。

也有女的。挂在男子臂上，太年青而时髦的女客，似乎只是一同进来看看。那边有一位中年的，上等的衣料却不是顶时式的裁制，和一位中年男子并排站着，仰起了脸。电光的红字跳一，她就推推那男子的臂膊；红字再跳一，她慌慌张张把男子拉在一边叽叽喳喳低声说了好一大片。

一位胡子刮得光光的，只穿了绸短衫裤，在人堆里晃来晃去踱方步，一边踱，一边频频用手掌拍着额角。

这当儿，池子里的做交易的叫喊始终是旋风似的，海潮似的。

你如果到上面月楼的铁栏干边往下面一看，你会忽然想到了旧小说里的神仙：“只听得下面杀声直冲，拨开云头一看”，你会清清楚楚看到中央的人圈怎样把手掌伸出缩回，而外圈的人们怎样钻来钻去，像大风雨前的蚂蚁。你还会看见时时有一团小东西，那是纸团，跟纽子一般模样的，从各方面飞到那中央的人圈。你会想到神仙们的祭起法宝来罢？

有这么一个纸团从月楼飞下去了。你于是留心到这宛然各在云端的月楼那半圆形罢。这半圆圈上这里那里坐着几个人，在记录着什么，肃静地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们背后墙上挂着些经纪人代表的字号牌子。谁能预先知道他们掷下去的纸团是使空头们哭的呢还是笑的？

无稽的谣言吹进了交易所里会激起债券涨落的大风波。人们是在谣言中幻想，在谣言中兴奋，或者吓出了灵魂。没有比他们更敏感的了。然而这对于谣言的敏感要是没有了，公债市场也就不成其为市场了。人心就是这么一种怪东西。

（原载 1936 年 2 月 15 日《良友画报》114 号，原题为《证券交易所——上海地方生活素描之五》，后由作者改名）

我的小学时代

大约是民国前八、九年罢，我的故乡×镇开始有小学。我就是这小学的第一班学生。

比这小学略早，×镇又有一个非中非小的“中西学校”。据说开办的时候，课程就只有中西两门——半日读《东莱博议》之类的书，半日读英文。后来，那位英文教员因为自己也懂得一点笔算，便提议加一门算学，于是直到现在还是中学校里三个权威的“国、英、算”，名义上是齐全了。“中西学校”第二个半年开始时，加聘了一位算学教员，可巧他又懂得物理和化学，于是课程上又多了两门。但是，我所进的×镇第一个小学却是一开头就排定了整整齐齐的课程：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算学、体操。没有音乐，因为那时候连“中西学校”也还没有音乐。

那时小学校的学费差不多等于零，然而教科书和石板、石笔之类，到底比《千字文》、《花夜记》，乃至《大学》、《中庸》贵些罢，所以有的家长还是不让他的子弟进小学。开学那天，居然有五、六十学生，那就幸赖校长是一乡人望，能够号召；另一原因是校址在人烟稠密的市中心。

无所谓入学试验，学生按年龄分班，大些的进甲班，小的进乙班；甲乙班的课程实在差不多，除了修身一门。我还依稀记得，甲班的修身是读《论语》，而乙班的却是文明书局出版的《修身教科书》。上课一星期以后，甲、乙班的学生又互有调动，我被编进甲班里去了。

教员只有两位，各教一班。甲班的教员不是本镇人，大家都说他“新学”确有根基；这是说他的算学好，而那时小学的课程能使一位教员表示他真懂“新学”的，恐怕也只有算学这一门。我的父亲是酷嗜算学的，曾经自修到微积分，那时他卧病在床已经两年了，还常常托人去买了新出的算学书来，要母亲翻开了竖着给他读，——因为他患的是“骨痠”，手活动不便。他见我转进了甲班，很高兴，为的是得了好的先生；但我倒担心，我对于算学已是惊弓之鸟，未进这小学的时候，曾受学于父亲，可是，你想，他卧病在床，连手也不大能动，单靠口说，叫我怎么弄得懂？父亲因此常常纳闷：为什么我于算学那样的“不近”。

甲班的先生，手是能够动的，能够用粉笔将复位乘法的过程在黑板上演算出来，并且教得又慢，所以我也慢慢地“近”起来了。同时，我也亲自体验了为什么人家说甲班先生的“新学”有根；因为他写阿拉伯数目字实在比乙班先生熟练得多。乙班先生写那8字始终是一对连接的圈子，这是他读“文章”打双圈时弄熟了的一手。

进这小学以前，我读过家塾，也读过私塾；念过《三字经》后，父亲就给我读“新学”了，那是从《正蒙必读》的《天文歌诀》节录出来的《天文歌略》。那时父亲还没病倒，他每天亲自节录四句，要我读熟，他说：“慢慢地加上，到一天十句为止。”可是我却慢慢地缩下来，每天读熟两句也还勉强。这一件事，也曾惹起父亲十分的烦恼。

这使得我那时幼稚的头脑对于所谓“新学”者，既害怕而又憎恶。同时又使我对于我所进的小学发生好感，因为这里的课程都比《天文歌略》容易记，也有兴味，即使是《论语》罢，孔子和弟子们的谈话无论如何总比天上的星座多点人间味。

但《论语》只是“修身”，作为国文课本的，却是新编的《文学初阶》

和《速通虚字法》。——乡下人称为“洋书”者是。这两本书都有图画，尤其是《速通虚字法》的插图，大大使我爱好。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速通虚字法》的编者和画者，实在是了不起的儿童心理学家；它的例句都能形象化，并且有鲜明的色彩。例如用“虎猛于马”这一句来说明“于”字的一种用法，同时那插图就是一只咆哮的老虎和一匹正在逃避的马；又如解释“更”字，用“此山高，彼山更高”这么一句，插图便是两座山头，一高一低，中间有两人在那里指手画脚，仰头赞叹。

《速通虚字法》帮助我造句，也帮助我能够读浅近的文言，更引起了我对于图画的兴味。我家屋后的堆破烂东西的平屋里，有不知属于哪一位叔曾祖的一板箱旧小说——当时称之为“闲书”，都是印刷极坏的木板书，虽有“绣像”，实在不合我的脾胃。画手和刻手都太拙劣，倒在其次；主要的原因是其中的人物都是“古衣冠”，而表情也和我们活人不同。可是这板箱里还有几十张石印的极工细的“平定发逆”的宣传画。这大概是我的曾祖在汉口寄回来的。这里的人物全是现代衣冠了，而且有兵、有大炮，有大刀队、钢叉队，非常热闹。我找得以后，高兴极了，但微感失望的，是重复太多，几十张只有五、六种名目，再则，上面虽有文字说明，可又深奥，读不懂。

木板的“闲书”中就有《西游记》。因为早就听母亲讲过《西游记》中间的片断的故事，这书名是熟悉的，可惜是烂木板，有些地方连行款都模糊成一片黑影。但也拣可看的看下去。不久，父亲也知道我在偷看“闲书”了，他说：“看看闲书也可把‘文理看通’。”就叫母亲把一部石印的《后西游记》给我看，为什么给《后西游记》呢？父亲的用意是如此：为了使得国文长进，小孩子想看“闲书”也在所不禁，然而倘是有精致的插图的“闲书”，那么小孩子一定没有耐心从头看下去，却只拣插图有趣的一回来看了，这是看图而非看书，所以不行。那部石印的《后西游记》是没有插图的。

那时小学校每月有考试。单试国文一题，可是郑重其事地要出榜，而且前几名还有奖赏，无非是铅笔之类。暑假年假大考自然也有奖赏，那就丰厚一点，笔墨等文具之外，也有书，——下学期用的教科书。可是有一次却奖赏了两本童话：《无猫国》和《大拇指》，我于是知道有专给小孩子看的“闲书”。不过我那时因为已经看了《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旧小说，习惯于大人的事情，对于《无猫国》之类并不怎样感到兴趣。这两本童话就送给了弟弟，他看着书中的图画，母亲讲给他听。

每星期一篇作文。题目老是史论。教员在黑板上写好了题目，一定要讲解几句，指示怎样立论，——有时还暗示着怎样从古事论到时事。当然不会怎样具体的，我们也似懂非懂；但我们都要争分数，先生既然说过应该带到现在，我们怎肯不带呢？结果就常常用一句公式的话来收梢：“后之为（ $\times \times$ ）者可不 \times 乎？”这一个公式实在是万应灵符，因为上半句“为”字下边可以填“人主”、“人父”、“人友”、“将帅”……什么都行，而下半句“不”字之下也可以随便配上“慎”、“戒”、“惧”、“勉”等等。

说来有点好笑，那时我们中间最大的不过十五、六岁，小的十一、二，照年龄而言，都还不是老气横秋地论古评今的时期，然而每星期一篇的史论把我们变成早熟，可又实在没有论古道今的知识和见解（先生也知道，所以出了题目一定要讲解），“硬地上掘蟾”，就弄出一套公式来了。这一套公式是三段的：第一，将题中的人或事叙述几句，第二，论断带感慨，第三就是上面说过的那一道万应灵符来收梢。这样的作文每星期一次，倘要说于我

们有什么好处，那至多亦不过很肤浅地弄熟一点史实，以及练习练习之乎者也的摆布罢了。对于思想的发展，毫无帮助。可是我现在想来，当时那位先生老叫我们做史论，也有他的用意；他是想叫学生留心国家大事。他自己是“新派”，颇有点政治思想。

最可怪的，我们弄惯了史论那一套公式，有时先生例外出个非史论的作文题，例如游××记之类，我们倒有点感到手足无措了。

两年以后，我就做了这小学的第一班毕业生。时在冬季。离这半年前，我的父亲故世。他卧病三年，肌肉落尽，那年夏天极热，他就像干了膏油的一盏灯，奄奄长瞑了。那年春天，他已自知不起，叫我搬出他的书籍和算草来整理；有几十本《新民丛报》，几套《格致汇编》，还有一本《仁学》，他吩咐特别包起来，说：“不久你也许能看了。”特别是那本《仁学》，他叮嘱我将来不可不读。他似乎很敬重这位“晚清思想界的慧星”谭嗣同先生。那时我曾把《仁学》翻了一下，可是不懂。

小学毕业那年，“中西学校”也迁到镇里来了（本来在市外），并且改名为高等小学校，我就进了这学校的三年级。但虽然名为高等小学校，最高年级（五年级，那时中间空一级，没有四年级的学生）却有几何、代数；英文读《纳氏文法》第三本。几何的课本是《形学备旨》，这是开天辟地那位教几何的先生选定的课本，后来那先生走了，这课本却传了代，直到后来我学的也还是这一本有光纸印的厚厚的线装的老家伙。

（原载 1938 年 5 月 16 日《宇宙风》68 期）

《新民丛报》：辛亥革命前梁启超主编的刊物。

《格致汇编》：清末在上海出版的包括物理、化学和博物等学科的读物。

《仁学》：谭嗣同的哲学著作。

风景谈

前夜看了《塞上风云》的预告片，便又回忆起猩猩峡外的沙漠来了。那还不能被称为“戈壁”，那在普通地图上，还不过是无名的小点，但是人类的肉眼已经不能望到它的边际，如果在中午阳光正射的时候，那单纯而强烈的返光会使你的眼睛不舒服；没有隆起的沙丘，也不见有半间泥房，四顾只是茫茫一片，那样的平坦，连一个“坎儿井”也找不到；那样的纯然一色，即使偶尔有些驼马的枯骨，它那微小的白光，也早溶入了周围的苍茫；又是那样的寂静，似乎只有热空气在作哄哄的火响。然而，你不能说，这里就没有“风景”。当地平线上出现了第一个黑点，当更多的黑点成为线，成为队，而且当微风把铃铛的柔声，丁当，丁当，送到你的耳鼓，而最后，当那些昂然高步的骆驼，排成整齐的方阵，安详然而坚定地愈行愈近，当骆驼队中领队驼所掌的那一杆长方形猩红大旗耀入你眼帘，而且大小丁当的谐和的合奏充满了你耳管，——这时间，也许你不出声，但是你的心里会涌上了这样的感想的：多么庄严，多么妩媚呀！这里是大自然的最单调最平板的一面，然而加上了人的活动，就完全改观，难道这不是“风景”吗？自然是伟大的，然而人类更伟大。

于是我又回忆起另一个画面，这就在所谓“黄土高原”！那边的山多数是秃顶的，然而层层的梯田，将秃顶装扮成稀稀落落有些黄毛的癞头，特别是那些高秆植物颀长而整齐，等待检阅的队伍似的，在晚风中摇曳，别有一种惹人怜爱的姿态。可是更妙的是三五月明之夜，天是那样的蓝，几乎透明似的，月亮离山顶，似乎不过几尺，远看山顶的小米丛密挺立，宛如人头上的怒发，这时候忽然从山脊上长出两支牛角来，随即牛的全身也出现，掬着犁的人形也出现，并不多，只有三两个，也许还跟着个小孩，他们姗姗而下，在蓝的天，黑的山，银色的月光的背景上，成就了一幅剪影，如果给田园诗人见了，必将赞叹为绝妙的题材。可是没有完。这几位晚归的种地人，还把他们那粗朴的短歌，用愉快的旋律，从山顶上飘下来，直到他们没入了山坳，依旧只有蓝天明月黑魃魃的山，歌声可是缭绕不散。

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场面。夕阳在山，干坼的黄土正吐出它在一天内所吸收的热，河水汤汤急流，似乎能把浅浅河床中的鹅卵石都冲走了似的。这时候，沿河的山坳里有一队人，从“生产”归来，兴奋的谈话中，至少有七八种不同的方音。忽然间，他们又用同一的音调，唱起雄壮的歌曲来了，他们的爽朗的笑声，落到水上，使得河水也似在笑。看他们的手，这是惯拿调色板的，那是昨天还拉着提琴的弓子伴奏着《生产曲》的，这是经常不离木刻刀的，那又是洋洋洒洒下笔如有神的，但现在，一律都被锄锹的木柄磨起了老茧了。他们在山坡下，被另一群所迎住。这里正燃起熊熊的野火，多少曾调朱弄粉的手儿，已经将金黄的小米饭，翠绿的油菜，准备齐全。这时候，太阳已经下山，却将它的余辉幻成了满天的彩霞，河水喧哗得更响了，跌在石上的便喷出了雪白的泡沫，人们把沾着黄土的脚伸在水里，任它冲刷，或者掬起水来，洗一把脸。在背山面水这样一个所在，静穆的自然和弥漫着生命力的人，就织成了美妙的图画。

在这里，蓝天明月，秃顶的山，单调的黄土，浅濞的水，似乎都是最恰当不过的背景，无可更换。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伟大的，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乃是伟大中之尤其伟大者！

我们都曾见过西装革履烫发旗袍高跟鞋的一对儿，在公园的角落，绿荫下长椅上，悄悄儿说话，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在一个下雨天，你经过一边是黄褐色的浊水，一边是怪石峭壁的崖岸，马蹄很小心地探入泥浆里，有时还不免打了一下跌撞，四面是静寂灰黄，没有一般所谓的生动鲜艳，然而，你忽然抬头看见高高的山壁上有几个天然的石洞，三层楼的亭子间似的，一对人儿促膝而坐，只凭剪发式样的不同，你方能辨认出一个是女的，他们被雨赶到了那里，大概聊天也聊够了，现在是摊开着一本札记簿，头凑在一处，一同在看，——试想一下，这样一个场面到了你眼前时，总该和在什么公园里看见了长椅上有一对儿在偎倚低语，颇有点味儿不同罢？如果在公园时你一眼瞥见，首先第一会是“这里有一对恋人”，那么，此时此际，倒是先感到那样一个沉闷的雨天，寂寞的荒山，原始的石洞，安上这么两个人，是一个“奇迹”，使大自然顿时生色！他们之是否恋人，落在问题之外。你所见的，是两个生命力旺盛的人，是两个清楚明白生活意义的人，在任何情形之下，他们不倦怠，也不会百无聊赖，更不至于从胡闹中求刺激，他们能够在任何情况之下，拿出他们那一套来，怡然自得。但是什么能使他们这样呢？

不过仍旧回到“风景”罢；在这里，人依然是“风景”的构成者，没有了人，还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再者，如果不是内生活极其充满的人作为这里的主宰，那又有什么值得怀念？

再有一个例子：如果你同意，二三十棵桃树可以称为林，那么这里要说的，正是这样一个桃林。花时已过，现在绿叶满株，却没有一个桃子。半爿旧石磨，是最漂亮的圆桌面，几尺断碑，或是一截旧阶石，那又是难得的几案。现成的大小石块作为凳子，——而这样的石凳也还是以奢侈品的姿态出现。这些怪样的家具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这里有一个茶社。桃林前面，有老百姓种的荞麦，也有大麻和玉米这一类高秆植物。荞麦正当开花，远望去就像一张粉红色的地毯，大麻和玉米就像是屏风，靠着地毯的边缘。太阳光从树叶的空隙落下来，在泥地上，石家具上，一抹一抹的金黄色。偶尔也听得有草虫在叫，带住在林边树上的马儿伸长了脖子就树干搔痒，也许是乐了，便长嘶起来。“这就不坏！”你也许要这样说。可不是，这里是有般所谓“风景”的一些条件的！然而，未必尽然。在高原的强烈阳光下，人们喜欢把这一片树荫作为户外的休息地点，因而添上了什么茶社，这是这个“风景区”成立的因缘，但如果把那二三十棵桃树，半爿磨石，几尺断碣，还有荞麦和大麻玉米，这些其实到处可遇的东西，看成了此所谓风景区的主要条件，那或者是会貽笑大方的。中国之大，比这美得多的所谓风景区，数也数不完，这个值得什么？所以应当从另一方面去看。现在请你坐下，来一杯清茶，两毛钱的枣子，也作一次桃园的茶客罢。如果你愿意先看女的，好，那边就有三四个，大概其中有一位刚接到家里寄给她的一点钱，今天来请同伴。那边又有几位，也围着一个石桌子，但只把随身带来的书籍代替了枣子和茶了。更有两位虎头虎脑的青年，他们走过“天下最难走的路”，现在却静静地坐着，温雅得和闺女一般。男女混合的一群，有坐的，也有蹲的，争论着一个哲学上的问题，时时哗然大笑，就在他们近边，长石条上躺着一位，一本书掩住了脸。这就够了，不用再多看。总之，这里有特别的氛围，但并不古怪。人们来这里，只为恢复工作后的疲劳，随便喝点，要是袋里有钱；或不喝，随便谈谈天；在有闲的只想找一点什么来消磨时间的人们看来，这里坐的不舒服，吃的喝的也太粗糙简单，也没有什么可以供赏玩，至多来一

次，第二次保管厌倦。但是不知道消磨时间为何物的人们却把这一片简陋的绿荫看得很可爱，因此，这桃林就很出名了。

因此，这里的“风景”也就值得留恋，人类的高贵精神的辐射，填补了自然界的贫乏，增添了景色，形式的和内容的。人创造了第二自然！

最后一段回忆是五月的北国。清晨，窗纸微微透白，万籁俱静，嘹亮的喇叭声，破空而来。我忽然想起了白天在—本贴照簿上所见的—张，银白色的背景前一个淡黑的侧影，一个号兵举起了喇叭在吹，严肃，坚决，勇敢，和高度的警觉，都表现在小号兵的挺直的胸膛和高高的眉棱上边。我赞美这摄影家的艺术，我回想着，我从当前的喇叭声中也听出了严肃，坚决，勇敢，和高度的警觉来，于是我披衣出去，打算看一看。空气非常清冽，朝霞笼住了左面的山，我看见山峰上的小号兵了。霞光射住他，只觉得他的额角异常发亮，然而，使我惊叹叫出声来的，是离他不远有一位荷枪的战士，面向着东方，严肃地站在那里，犹如雕像一般。晨风吹着喇叭的红绸子，只这是动的，战士枪尖的刺刀闪着寒光，在粉红的霞色中，只这是刚性的。我看得呆了，我仿佛看见了民族的精神化身而为他们两个。

如果你也当它是“风景”，那便是真的风景，是伟大中之最伟大者！

1940年12月，于枣子岗垭

（原载1941年1月10日《文艺阵地》6卷1期）

兰州杂碎

南方人一到兰州，这才觉得生活的味儿大不相同。

一九三九年的正月，兰州还没有遭到轰炸，唯一漂亮的旅馆是中国旅行社办的“兰州招待所”。三星期之内，“招待所”的大厅内，有过七八次的大宴会，做过五次的喜事，其中最热闹的一次喜事，还把“招待所”的空客房全部租下。新郎是一个空军将士，据说是请准了三天假来办这场喜事，假期一满，就要出发，于是“招待所”的一间最大的客房，就权充作三天的洞房。

“招待所”是旧式房屋，可是有新式门窗，绿油的窗，红油的柱子，真辉煌！有一口自流井，抽水筒成天 ka-ta-ka-ta 地叫着。

在上海受过训练的南方籍茶房，给旅客端进了洗脸水和茶水来了；嘿，清的倒是洗脸的，浑的倒是喝的么？不错！清的是井水，是苦水，别说喝，光是洗脸也叫你的皮肤涩巴巴地难受；不用肥皂倒还好，一用了肥皂，你脸上的尘土就腻住了毛孔，越发弄不下。这是含有多量硷质的苦水，虽清，却不中使。

浑的却是河水。那是甜水。一玻璃杯的水，回头沉淀下来，倒有小半杯的泥浆，然而这是“甜”水，这是花五毛钱一担从城外黄河里挑来的。

不过苦水也还是水。甘肃省有许多地方，据说，连苦水也是宝贝，一个人独用一盆洗脸水，那简直是“骇人听闻”的奢侈！吃完了面条，伸出舌头来舐干那碗上的浓厚的浆汁算是懂得礼节。用水洗碗——这是从来没有的。老百姓生平只洗两次身：出世一次，去世一次。呜呼，生在水乡的人们哪里想得到水竟是这样宝贵？正如不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之可贵。

然而在洪荒之世，甘肃省大部分恐怕还是一个内海呢！今之高原，昔为海底。单看兰州附近一带山壁的断面，像夹肉面包似的一层夹着一层的，隐约还见有贝壳的残余。但也许是古代河床的遗迹，因为黄河就在兰州身边过去。

正当腊月，黄河有半边是冻结的，人、牲畜、车子，在覆盖着一层薄雪的冰上走。但那半边，滔滔滚滚的急流，从不知何处的远远的上游，挟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冰块，作雷鸣而去，日夜不休。冰块都戴着雪帽，浩浩荡荡下来，经过黄河铁桥时互相碰击，也碰着桥础，于是隆隆之中杂以訇豁的尖音。这里的河面不算仄，十丈宽是有的，站在铁桥上遥望上游，冰块拥挤而来，那上面的积雪反映日光，耀眩夺目，实在奇伟。但可惜，黄河铁桥上是不许站立的，因为是“非常时期”，因为黄河铁桥是有关国防的。

兰州城外的河水就是那样湍急，所以没有鱼。不过，在冬天兰州人也可以吃到鱼，那是青海湟水的产物，冰冻如石。三九年的正月，兰州的生活程度在全国说来，算是高的，这样的“湟鱼”，较大者约三块钱一尾。

三九年三月以前，兰州虽常有警报，却未被炸；兰州城不大，城内防空洞不多，城垣下则所在有之。但入口奇窄而向下，俯瞰宛如鼠穴。警报来时，居民大都跑避城外；城外群山环绕，但皆童山，人们坐山坡下，蚂蚁似的一堆一堆，老远就看见。旧历除夕前一日，城外飞机场被炸，投弹百余，但据说仅死一狗。这是兰州的“处女炸”。越三日，是为旧历新年初二，日机又来“拜年”，这回在城内投弹了，可是空战结果，被我方击落七架（或云九架），这是“新年的礼物”。从此以后，老羞成怒的滥炸便开始了，几乎每

一条街，每一条巷，都中过炸弹。四 年春季的一个旅客，在浮土寸许厚、软如地毯的兰州城内关外走一趟，便往往看见有许多房子，大门还好好的，从门隙窥视，内部却是一片瓦砾。

但是，请你千万不要误会兰州就此荒凉了。依着“中国人自有办法”的规律，四 年春季的兰州比一年前更加“繁荣”，更加飘飘然。不说俏皮话，经过多次滥炸后的兰州，确有了若干“建设”：物证就是有几条烂马路是放宽了，铺平了，路两旁排列着簇新的平房，等候商人们去繁荣市面；而尤其令人感谢的，电灯也居然像“电”灯了。这是因为一年中间整饬市容的责任，是放在一双有计划的切实的手里，而这一双手，闲时又常常翻阅新的书报——在于，然而也在朝四面看看，不是那种一埋首就看见了自己的脚色。

但所谓“繁荣”，却也有它的另一方面。比方说，三九年的春天，要买一块肥皂，一条毛巾，或者其他的化妆品，当然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可是货色之缺乏，却也显而易见。至于其他“洋货”，凡是带点奢侈性的，只有几家“百货店”方有存储，而且你要是嫌他们“货色不齐全”时，店员就宣告道：“再也没有了。这还是从前进来的货呢，新货来不了！”但是隔了一年工夫，景象完全不同，新开张的洋货铺子三三两两地在从前没有此类店铺的马路上出现了，新奇的美术字的招牌异常触目，货物的陈列式样也宛然是“上海气派”；陌生牌子的化妆品，人造丝袜、棉毛衫裤、吊袜带、手帕、小镜子、西装领带，应有尽有，非常充足。特别是玻璃杯，一年以前几乎少见的，这时也每家杂货铺里都有了。而且还有步哨似的地摊，则洋货之中，间或也有些土货。手电筒和劣质的自来水笔、自动铅笔，在地摊上也常常看到。战争和封锁，并没有影响到西北大后方兰州的洋货商——不，他们的货物的来源，倒是愈“战”愈畅旺了！何以故？因为“中国人自有办法”。

为了谋战争时的自给，中国早就有了“工合”运动。“工合”在西北大概颇组织了些手工业。但是今天充斥了西北大小城市（不但是兰州）里的工业品，有多少是“工合”的出品呢？真是天晓得。大多数商人不知道有所谓“工合”，你如果问他们货从哪里来的，他们毫不犹豫地答着：“天津”或“上海”。这意思就是：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还有中国人办的工厂，所以这些工业品也就是中国货了。偶尔也有一二非常干练的老板，则在上下打量你一番之后，便幽默地笑道：“咱们是批来的，人家说什么，咱们信什么；反正是那么一回事，非常时期吗，可不是？”

一个在特种机关里混事的小家伙发牢骚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组织，有包运的，也有包销的。在路上时，有武装保护，到了地头，又有虎头牌撑腰。值一块钱的东西，脱出手去便成为十块二十块，真是国难财！然而，这是一种特权，差不多的人，休想染指。全部的缉私机构在他们的手里。有些不知死活的老百姓，穷昏了，居然也走这一道，肩挑背驮的，老鼠似的抄小路硬走个十站八站路，居然也会弄进些来；可是，沿途碰到零星的队伍，哪一处能够白放过，总得点缀点缀。要是最后一关碰到正主儿的检查，那就完了蛋，货充公，人也押起来。前些时，查出一个巧法儿：女人们把洋布缠在身上，装作大肚子混进来。现在凡是大肚子女人，都要脱光了检验……嘿，你这该明白了罢，——一句话，一方面是大量的化公为私，又一方面则是涓滴归‘公’呵！”

这问题，决非限于一隅，是有全国性的，不过，据说也划有势力范围，各守防地，不相侵犯。这也属于所谓“中国人自有办法”。

地大物博的中国，理应事事不会没有“办法”，而且打仗亦既三年多，有些事也应早有点“办法”。西北一带的根本问题是“水”。有一位水利专家指点那些秃顶的黄土山说：“土质并不坏，只要有水！”又有一位农业家看中了兰州的水果，幻想着如何装罐头输出。皋兰县是出产好水果的，有名的“醉瓜”，甜而多汁，入口即化，又带着香蕉味一般的酒香。这种醉瓜，不知到底是哈密瓜的变种呢，或由它一变而为哈密瓜，但总之，并不比哈密瓜差。苹果、沙果、梨子，也都不坏。皋兰县是有发展果园的前途的。不过，在此“非常时期”，大事正多，自然谈不到。

（原载 1941 年 4 月 8 日至 5 月 16 日《华商报·灯塔》）

白杨礼赞

白杨树实在不是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毯子；黄的，那是土，未开垦的处女土，几百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所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是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是在你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儿罢？

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地有一排，——不，或者甚至只是三五株，一二株，傲然地耸立，像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恹恹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

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一种树！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像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桠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横斜逸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来粗细罢，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二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

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决不是平凡的树！

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逸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却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觉得树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

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

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贱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干秀颀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罢，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原载 1941 年 4 月 8 日至 5 月 16 日《华商报·灯塔》）

萧楚女与恽代英

民十四五年的《中国青年》杂志，在当时青年运动上，为一权威的刊物。常在《中国青年》撰稿诸人中，其尤受读者欢迎而影响巨大者，当推萧楚女与恽代英。

萧楚女为湖北人，与恽代英同乡。楚女略长数岁。二人皆健笔，又同为天才的雄辩家，其生活之刻苦又相似。平居宴谈，都富于幽默味；然楚女纵谈沉酣时，每目瞋而脸歪，口沫四溅，激昂凌厉，震慑四座，代英则始终神色不变，慢条斯理，保持其一贯的冷静而诙谐的作风。

二人之文，风格亦不同，代英绵密而楚女豪放，代英于庄谐杂作中见其煽动力，楚女则剽悍劲拔，气势夺人。其于演讲亦然。楚女之演词，有如进军鼓角，代英则有时嘲讽，有时诙谐，有时庄言，历二三小时，讲者滔滔无止境，听者亦无倦容。然雅俗共赏，刺激力强，则又为二人所共同擅长。

当“楚女”之名见于各报各刊物时，读者每以为一女性作家。及知为实一男子，则又想像其气度，以为必潇洒风流，神采照人。某次一集会，楚女已先到，有未与楚女谋面者询曰：“萧楚女还没到么？”楚女即应声答曰：“一开会，他就到。”众皆哄然大笑。盖楚女身材高大，面黑而麻，服装随便，有丘八风，远非美男子之伦。然楚女以是久久不得爱人。会有曾往苏联学习归来之郭女士（河北人），亦以未有配偶，郭亦魁梧而面麻，两方稔友咸谓此乃“门当户对”，因为之介。然二人既相晤后，意都不属。民十六春，楚女在粤殉难，犹是独身。而郭女在北方工作，不久亦为捕杀。

民十五春二月，楚女自沪赴广州，任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并兼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官。军校学生听楚女课者，凡二三千，大礼堂亦不能容，则在操场中授课。第一次上课，讲未多时，值日官清楚女“再高声些”。楚女嗓子本颇洪亮，然因在露天，人数又多，后排者尚不能听清，于是楚女运气高呼，不意用力太猛，裤带崩断，幸钮扣尚固。裤仅稍落。楚女乃一手按腰，讲完了九十分钟。厥后楚女语人：“此为生平第一次窘事”云。

然楚女性格，又有其极温婉之一面。朋辈偶闹意见，楚女常为排解。某君夫妇反目，楚女力劝其妻，卒归和好。

北伐军兴，楚女因肺病不能从军北上，留广州东山医院疗治。翌年病更剧。然仍不能免祸。被捕之日，呕血数碗，两人挟持之，始能步出医院，旋即被害。

代英毕业武昌文华大学，初为“少年中国社”有力分子，后加入中共，为青年运动之健将，曾任少共中执委。北伐前，上海国民党党务工作受多方面之压迫破坏，为最艰苦之时代，其时代英埋首为国民党地下工作，任上海特别市党部之宣传部长。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代英为上海六代表之一，赴广州出席。在大会中发挥其演说之天才，备受到会代表之拥护。大会闭幕后，代英留粤，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因其学养有素，器识凝重，办事负责，生活刻苦，颇得员生信仰。国民政府移武昌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亦成立，代英仍为政治总教官。一日，校中同事或言代英将结婚，询之，则莞尔曰：“不抱独身主义的人，大概总有一天会结婚的罢。”再询以日期，则谓“连我也还没知道呢”。越二三月，代英忽请假一天，此为破天荒之事，于是断定其将结婚属实。不料次日一早，代英施施然来，仍是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冷静而和善的神气，仅新剃了头。来即办公。有询以婚事，则慢条斯

理答道：“不是昨天已经结过了么？”

代英与其夫人，本属中表，幼时订婚。代英奔走革命，以有家室为累，本要抱独身主义，曾以此意函告父母，其未婚妻闻之，则亦以独身自矢，并教小学自给。至是，代英既因职务在武昌有较长期之居留，遂遵父母之命结婚。夫人端庄淑静，生活亦极朴素，婚后仍教小学。

政变以后，代英复居上海，仍尽力于革命。艰难困苦，非片言可尽。越一载，一机关破获，代英被执，判五年监禁，然而不知其为恽代英也。期满将释，复有叛徒告密，移解以后，即被害。

代英刻苦宽厚，无丝毫嗜好，未尝见其疾言厉色，友朋呼之为“圣人”。终年御一灰布长袍，不戴帽。体貌清癯，而精力过人。横遭挫折，不得展其抱负，是亦中国革命一大损失也，呜呼！

（原载 1941 年 9 月 5 日至 11 月 16 日《笔谈》1 期至 6 期）

记“鲁迅艺术文学院”

我猜想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贫寒的西北角，有这样一个学校。

在广大的中国，在全民族为求自由解放而抗战已经四年，正迫切地需要坚强勇毅的文艺战士的今日，纪念鲁迅先生的学术机关，现在还只有这一个；而把文学艺术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和生活认识与革命经验密切地联系配合起来的，现在也还只有这一个“鲁迅艺术文学院”。

我想来一定早有人介绍过这个学校了，但是，象征着中华民族新生力量的“鲁艺”——即“鲁迅艺术文学院”的简称，是一天天在进步，在发展。我虽不文，但如能就我亲见亲闻，记下它的发展史中的一页，或者也是读者所乐许罢：

一九四一年之五月，我从新疆迪化四川内地，经过西安的时候，就打算到延安去参观，刚好有便车，五月廿四、五，到了延安，六月初，借寓于“鲁艺”所在地的桥儿沟的东山，一住四个月，双十节始离延安南下至重庆。这四个月，我可说是和“鲁艺”生活在一起的；我在我的寓居——窑洞里，可以听得山下“鲁艺”上课下课的钟声，可以听得音乐系的学生们练习合唱，我走出窑洞，在门外的空场上停立，就可以看见山下“鲁艺”校舍的全景，看见一律灰布制服的男女学生在校舍各处往来；我向对面看，则西山那一排新开始的整整齐齐的窑洞以及那蜿蜒曲折而下，数百步的石级，实在美丽而雄壮；那是“鲁艺”附属的美术工场所在。我还可以俯瞰东山与西山之间那“山谷”中的一片绿野，这里布满着各种农作物，——青菜、茄子、玉蜀黍、南瓜、洋薯、番茄——而番茄尤为桥儿沟的特产，是从前一个西班牙的神甫从西方带了种子来的。这许多繁茂的农作物之中，有一部分就是“鲁艺”师生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生产”的果实。你如果读过夏蕾女士（她是在“鲁艺”教书的某著名漫画家的夫人）的《生产插曲》，你就知道生产运动在“鲁艺”简直是一首美妙的牧歌呵！

从我所住的窑洞出去，沿着半山腰的路，绕过另一山头，便到了延安颇有名的“鲁艺教员东山住宅区”。这也一律是窑洞，这里是文艺家之家，但正因为住的人是文艺家，所以每一个窑洞的布置装饰各各不同，充分表现出那主人的独特的个性来。每一个艺术家运用他巧妙的匠心，从最简陋的物质条件中亲手将他们的住所（窑洞）布置得或清雅，或明艳，或雄壮而奇特。每当夕阳在山，红霞照眼，这遥遥相对的东西两山，（教员住宅区与美术工场区）便有一簇一簇的人儿，在他们门前的广场上（请记得，这是在山顶，而且扩展成为大可作球戏的广度，而且横跨了两三个山头的），逍遥散步，谈天游戏。

艺术家的夫人们，用她们自制的小坐车推着孩子们慢慢地走，或者是抱着挽着她们的孩子们聚在一堆谈天。她们也是一律的灰布制服，但是她们的“小天使们”却一个个打扮得新奇艳丽——用了她们在“外边”所穿的衣服为原料，用了她们巧妙的勤劳的十指。你也可以看见那边一小堆人谈论得很热烈，从前线回来不久的小说家荒煤，在滔滔不绝有声有色讲述前方的文艺工作，民众运动；巨人型的木刻家马达，叼着他那手制的巨大烟斗，站在旁边听，照例是只把那浓眉的耸动来代替说话。

朗爽的清脆的甜蜜的各样笑声，被阵阵的和风，带到下边的山谷里，背驮着斜晖的牛羊从对面山坡上徐徐而下，而“鲁艺”的驴马群也许正在谷中

绿草地上打滚嬉戏地追逐。

“鲁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围，就是这样的！

“鲁艺”的校舍是延安唯一的道地的西式建筑。大约是一九二五年罢，西班牙的神甫在桥儿沟经营了这巍峨的建筑。全体是石头和砖的，峨特式的门窗，可容五六百人的大礼拜堂（现在是大礼堂），它那高耸入云的一对尖塔，远远就可以望到，那塔尖的十字架也依然无恙，“鲁艺”美术系的一个学生——富有天才的青年木刻家古元，曾经取这从前的“大礼拜堂”及其塔尖为题材，作了一幅美妙的木刻，题名曰《圣经时代已经过去了》；正像这幅木刻所示，现在这所巍峨的建筑四周的大树荫下，你可以时时看见有些男女把一只简陋的木凳子侧卧过来，靠着树干，作成一种所谓“延安作风”的躺椅，手一卷书，逍遥自在的在那里阅读。大礼堂内，昨天是讲演会，有学问有经验有斗争历史的“老干部”讲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形势，或者是从前线回来的老战士作一个华北抗日根据地文化动态的报告，或者是“长征的英雄”演述长征的故事，青草地，猓猓国，雪山，大渡河。但今天则是怡心悦目的晚会了，“鲁艺”的“实验剧团”演出了果戈尔的，莫里哀的，莎士比亚的不朽名作。或者是曹禺的《雷雨》和《日出》，或者是“鲁艺”戏剧系教师王震之（也是不久以前刚从前方回来的）根据了华北前方的实际生活新编的四幕剧《佃户》，或是又是姚时晓的现实主义的独幕剧《棋局未终》和《闲话江南》了。那时候，你会惊异，哪里来的这么婀娜潇洒的都市风的摩登姑娘？在桥儿沟，从没见过这样的人呀！然而这是“实验剧团”的演员，“鲁艺”戏剧系的助教或学生；昨天也许她还身上是灰布制服，脚上是草鞋，在“生产队”中抡起了锄头；她是从大都市来的，从前曾经穿厌了绮罗，住惯了洋房，曾在北平或上海的有名的大学里念书，或竟已经毕业了，但现在她是灰布制服，草鞋，爬山，吃小米饭的“鲁艺”学生！“鲁艺”的“平剧团”，也许在晚会中也有一个节目，演出了《八大锤》或《打渔杀家》；那时你会吃惊地认出来：这里有好多位“男女同志”也是演话剧的好手，而且你还记得不多几天以前他们还和你讨论国际政治经济的形势，抗战的现阶段的一些问题，文艺上的现实主义，“民族形式”，贝多芬，谭鑫培，汪笑侬，也许还有人指着“平剧团”中一个鼓手，一个老头儿，告诉你：这位俨然正容打鼓的老头儿从前是江西的一个商人，家景很不差，酷爱平剧，但是“发狂似的”舍施了家财，万里长征，参加了“平剧团”，担任了鼓手的任务。

“鲁艺”的音乐系也来一个节目，他们人数不多，不能演奏作曲家冼星海所作的《黄河大合唱》，（那在延安通常是二三百人的合唱，最多为五六百，至少也有一百多人，）但他们的新曲多着，可以是北方民间小调，也可以是西欧古典作家名作的一段，也可以是蒙古和青海的民歌，而且提琴独奏和口琴独奏也是素擅胜场。

你也许抽空窥看一下演员们的化装室罢？那就在舞台后面一个小房，你看见正在烫头发。你记得那位“长征”过来的“理发师同志”并不会这一套。仔细一认，才知道那临时技师原来也是学生。她以前自然是端坐着让人家给她烫发的，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拿起钳子为人家烫，但现在既需要这么一手，她也就干，也就会了！而那边一排房子据说是“实验团”的道具服装室，你进去一看，多么整齐，管理员指着那形形色式的服装告诉你：这些，大部分是教员和学生自己带来的衣服，延安是穷的，“鲁艺”也是穷的，哪里有钱设备剧团的服装！

在“鲁艺”，有不少在“外边”成名的导演和演员，但更多的是崭露头角的新人，他们的技术曾使那多见多闻的中国制片厂的头等艺人大为惊讶。当拍摄《塞上风云》外景的一行人，由蒙边回渝，经过延安的时候，适逢演出曹禺的《日出》，他们看了以后赞叹道：“想不到你们在这里演出这样的大戏，而且演得这样好！”

在“鲁艺”，聚集着全国各省的青年；他们的身世也多式多样，有在国内最贵族式的大学将毕业的，也有家景平平，曾在社会混过事的，更有些是“南洋伯”的佳儿女，偷偷从家庭里跑出来的，有海关邮局的职员，有中小学教员，有经过战斗的“平津流亡学生”。他们齐集在“鲁艺”，为了一个信念：娴习文艺这武器的理论与实践，为民族之自由解放而服务！

“鲁艺”的学生有四五百，但教师和工作人员也有二三百。你觉得奇怪么？其实说明了一点也不怪。“鲁艺”并不采取“填鸭式”的教学法，它是由学生自动研究，各自发挥其所长为主体，而以教师的讲解指导为辅佐的，所以除了正规教师而外，又有不少介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指导员，各系都有。指导员们自己学习，同时又帮助学生，他们都是优秀的文艺青年，也有的已经是新作家。除了文艺部门的教师和指导员，又有社会科学，哲学部门的教师和教导员，他们除了学识丰富，还有长期的斗争经验和多种多样的生活经验。

“鲁艺”现在有四系，文学，戏剧，音乐，美术。修业期限为二年。在此时间要娴习基本的技术知识，并须立下高深理论研究的基础。你觉得二年的时间太短促么？但民族社会的需要太迫切了，不能不赶快。所以每周上课时间虽有廿多小时，而“实践”的时间还要多。戏剧系和音乐系“实践”的场所是经常在开各种晚会，美术系献身手的地方是没有空间的限制的，而且他们还有“美术工场”。至于“文学系”，则有他们自己的壁报以及延安出版的各种刊物。

学习性质的小组会，其重要性不下于课堂教授。在小组会中，指导员的作用，就可以看出来，一个文艺方面造诣颇高而又对于社会科学有研究的指导员，常能使他所参加的那一组学生进步特别快。

“鲁艺”还只有三年的历史，——以前名为鲁迅艺术师范——但改为两年制还只有两年工夫。不过时间虽短，贡献却已不少。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以及游击部队中，到处可见“鲁艺”毕业生的踪迹。“鲁艺”图书馆中藏有“鲁艺同学”从前方寄回的各种成绩。就中美术系学生的木刻（宣传性质的新式漫画，故事性的连环木刻等），最为出色。大抵“鲁艺”学生在前方最活跃的，是戏剧系，音乐系和美术系，文学系只好排在末位，这一半因为文学系要借文学来表现，在文盲众多的农村中，文学作品不免形同奢侈品了，又一半则因善能运用文学而具有深入浅出之妙者，亦尚难找。然这是就各系比较而言，非谓文学系学生遂无佼佼者，事实上他们写了不少很好的关于前方的报告文学。

一九三九年尾，“鲁艺”派出去一班毕业生到华北前线，这是一个混合性的文化纵队，有戏剧工作者，歌咏工作者，美术及文学工作者。他们随同两支被派往华北去的武装队伍出发，冲过敌人的三道封锁线，急行军时一夜走百五十里，有时无水可喝，连马溺也喝过；四年六月他们到达目的地后第一次写出来给母校同学的长信，揭示在“鲁艺”的报告处了，从这信里，我们知道他们一路所遇的艰险，但从这信中又看出他们的精神多么奋发而愉

快。他们全体一百多人在冲过封锁线时只有二人掉队，存亡未卜，但这二位都是男生，女生没有一个掉队。

在这封信到了以后约一月，“鲁艺”的又一“实习计划”成熟了。这次所派也是混成队，但分成数小队，目的地是“边区”。这新的计划是根据了在前方工作若干时回来的教师们的报告而拟订的。过去的工作方式，有若干是被修改了；新计划的主要点是要被派出的人员先真正地充实各自的生活，——多了解各地的社会情形，多了解民众，而不以走马看花式的写报告文学为急务。依这方针被派出的人员到了目的地后，不像从前那样以文艺写作者的特殊姿态出现，而以一个普通工作者的身份参加到当地的各種工作里去。一年半载以后，然后再谈写作。不过在此期间，他们和“鲁艺”各系还是要保持经常的联络，他们要就实地工作中提出有关文艺运动的意见，而“鲁艺”各系，要经常给他们以指示。这新计划下所编的数小队，每队有一队长，则是指导员或教师担任的。这几队虽然是在“边区”工作，但生活之刻苦不下于前方，因为“边区”民众对于一些稍有“拿身份”倾向的工作人员就不满意，更不用说摆官架子了，而知识分子生活习惯之未能全然群众化，即“鲁艺”学生亦时或不免。

北方的夏季晚上总是凉快的。月圆之夜，天空无半点云彩，仰视长空，万里深蓝，明星点点。这时候，“鲁艺”大礼堂后边第一个院子里，正展开一幅诗意的画面，两列峨特式的石头建筑，巍然隔院而对峙，这是学生的宿舍。作为近厢的另一列房子，则是会客室和办公室，三面游廊，很整齐的石级。月明之下，树影婆娑，三人五人一小堆一小堆的青年，席地而坐，有靠着一株树的，也有在游廊的石级上的，有人在低语谈心，有人在月光下看书，但也有人琮琮地弹着曼陀琳，有人在低声的和唱，如微风穿幽篁，悠然而又洒然，但渐渐和唱者多了，从宿舍里也传出了歌曲的旋律，于是突然，男中音，女高音，一齐进发，曼陀琳以外又加进了小提琴和箫管，错落回旋，而终于大家不谋而合地唱起“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来。这时候，也许和风又送来了黑头的悲凉苍老的唱歌词，那是相距不远的“平剧团”的“同志”们也在户外休息了。歌声像风发云涌，愈来愈高愈壮烈，到了顶点，忽然一下停止，大家都又不约而同朗声纵笑起来，然而笑声过后，从树影下又轻轻传出带点哀婉味儿的民歌的旋律，三个女同志坐成品字形，脸对着苍穹，深有所思地低声唱着。四周静的像入了云似的。民歌唱到第二叠，声音低细到不可得闻了。稍顷，曼陀琳声复作，于是错综的笑语也在四处陆续起来。有人扬声念道，“发思古之幽情，扬大汉之天声。”但语音未终，早为一阵元神旺盛的笑声所淹没。

这些穿灰布制服吃小米饭的青年男女，就是这样的情感淋漓，大气磅礴的！

（原载 1941 年 10 月 16 日和 11 月 16 日《学习》5 卷 2 期、4 期）

新疆风土杂忆

晚清左宗棠进军新疆，沿途筑路栽树，其所植之柳，今尚有存者。那时湘人杨某（忘其名）曾有诗曰：

大将西征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有人说，创现在新疆地主引水灌田的所谓“坎儿井”，不是左宗棠而是林则徐。但“坎儿井”之创设，也是左宗棠开始的。“坎儿井”者，横贯砂碛之一串井，每井自下凿通，成为地下之渠，水从地下行，乃得自水源处达于所欲灌溉之田。此因砂碛不宜开渠，骄阳之下，水易干涸，故创为引水自地下行之法。水源往往离田甚远，多则百里，少亦数十里。“坎儿井”隔三四丈一个，从飞机上俯瞰，但见黑点如连珠，宛如一道虚线横贯于砂碛，工程之大，不难想见；所以又听说，新省地主计财产时，往往不举田亩之数而举“坎儿井”之数，盖地广人稀，拥田多不为奇，惟拥有数百乃至数千之“坎儿井”者，则开井之费已甚可观，故足表示其富有之程度也。此犹新省之大牧畜主，所有牛羊亦不以数计，而以“山”计；何谓以“山”计？据言大“把爷”羊群之大，难于数计，每晚放牧归来，仅驱羊群入山谷，自山顶望之，见谷已满，即便了事。所以大“把爷”计其财产时，亦不曰有牛羊若干千百头，而曰有牛羊几山。

本为鲜卑民歌，从鲜卑语译成汉文的《敕勒歌》，其词曰：“敕勒川，阴山下；天如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前人评此歌末句为“神来之笔”，然在习惯此种生活之游牧民族，此实为平凡之现实，不过非有此生活实感者，也道不出这一句的只字来。此种“风吹草低见牛羊”之景象，在今日南北疆之大草原中，尚往往可见。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丰茂的牧草，高及人肩，几千牛羊隐在那里啃草，远望如何能见？天风骤来，丰草偃仰，然后知道还有那么多牛羊在那里！

新疆是一块高原，但在洪荒时代，她是中央亚细亚的大内海的一部分。这一苍海，在地质学上的哪一纪始变为高原？正如亚洲之边缘何时断离而为南洋群岛，同样尚未有定论。今新省境内，盐碛尚所在有之。昔年自哈密乘车赴吐鲁番，途中遥见远处白光一片，似为一个很大的湖泊，很是惊异，砂碛中难道竟有这样的大湖泊？乃至稍近，乃辨明此白皑皑者，实非流动之水而为固体之盐。阳光逼照，返光甚强，使人目眩。因新疆古为内海，故留此盐碛。然新省之盐，据谓缺少碘质，迪化的讲究卫生的人家都用苏联来的精盐。又盐碛之盐，与云南之岩盐不同；岩盐成块如石，而盐碛之盐则为粒状，粗细不等，曾见最粗者如棋子而形方，故食用时尚须略加磨捣。

吐鲁番地势甚低。新疆一般地形皆高出海面一二千公尺，独吐鲁番低于海面数百公尺，故自全疆地形而言，吐鲁番宛如一洞。俗谓《西游记》所写之火焰山，即今之吐鲁番，则其热可想而知。此地难分四季，只可谓尚有寒暑而已。大抵阳历正二三月，尚不甚热，白天屋内须衣薄棉，晚上还要冷些；五月以后则燥热难堪，居民于正午时都进地窖休息，仅清晨薄暮始有市集。

“把爷”：维吾尔族语，即财主。

以故吐鲁番居民家家有地窖，街上跨街搭荫棚，间亦有种瓜果葡萄盘缘棚上者，市街风景，自有一格。最热之时，亦在阳历七八月，俗谓此时壁上可以烙饼，鸡蛋可以晒熟；而公安局长蹲大水缸中办公，则我在迪化时曾闻吐鲁番来人之言，当必不虚。

然吐鲁番虽热，仍是个好地方，地宜植棉，棉质之佳，不亚于埃及棉。又多产蔬菜水果。内地艳称之哈密瓜，其实不尽产于哈密，都善与吐鲁番皆产之，而吐鲁番所产尤佳。石榴甚大，粒粒如红宝石。葡萄在新疆，产地不少，然以吐鲁番所产，驰名全疆。无核之一种，虽小而甜，晒为干，胜于美国所产。新疆有民谣曰：“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库车的杨姑，一朵花。”（《新疆图志》亦载此谣）然则哈密之瓜，固有其历史地位。惟自马仲英两度焚掠而后，哈密回城已成废墟，汉城亦萧条冷落，未复旧观，或哈密之瓜亦不如昔年乎？这可难以究诘了。民谣中之“库车”，在南疆，即古龟兹国，紫羔以库车产者为最佳；“杨姑”，维族语少女也。相传谓库车妇人多美丽，故民谣中如是云尔。库车居民多维吾尔族（即元史所称畏兀儿族，前清时俗称缠回或缠头）。不仅库车，南疆各地皆然。

迪化自春至秋，常有南来燥热之风，云是吐鲁番吹来，故俗名“吐鲁番风”。吐鲁番风既至，人皆感不适，轻则神思倦怠，重则头目晕眩，且发烧；体虚者甚至风未到前三四日即有预感。或谓此风来源实不在吐鲁番，而在南疆塔里木盆地之大戈壁，不过经由吐鲁番，逾天山缺口之大坂城而至迪化耳。大坂城者，为自吐鲁番到迪化所过的天山一缺口，然已甚高；过大坂城则迪化已在脚下，此为自南路进迪化之一要隘。

忆《隋书》谓炀帝得龟兹乐，列为燕乐之一，此后中国燕乐，龟兹乐实居重要部分。古龟兹国，即今新疆库车县。龟兹乐何如，今日新疆维族之音乐歌舞是否与龟兹乐相似，颇难猝下断语。盖自伊斯兰教代佛教而后，天竺文物，渐灭殆尽；今日新省维吾尔民族之歌舞，与中亚各民族之歌舞想相近似。迪化每有晚会，往往有维族之歌舞节目；男女二人，载歌载舞，歌为维语，音调颇柔美，时有顶点，则喜悦之情，洋洋欲溢，舞容亦婉约而雍穆；盖在维族的民族形式歌舞中，此为最上乘者。据言，此旧为男女相悦之歌，今倚旧谱而填新词，则已变男女相悦而为政治之内容矣。以我观之，旧瓶新酒，尚无牵强之痕迹。我曾问维族人翻译哈美德：“新词是谁的手笔？”他答道：“也不知是谁，大概是许多人集体的作品。”

维语为复音语文，其字母借用阿拉伯文的字母。书写时，横行而自右至左，外行人视之，似甚不便，然彼人走笔如飞，形式且极美丽。文法不甚复杂，曾习他种外国语者，用功半年，即可通晓。在新疆，虽有十四民族，然维吾尔语，实为可以通行全疆之语言，此因维族人数约占全疆总人口之半，其他各少数民族大都晓维语；哈萨克族人口在全疆仅次于维族，其语文与维语大同小异，其字母，亦为阿拉伯文字母。迪化每开大会，演说时例须用三种语言，即汉、维，及蒙古语，平常的集会，为节省时间，仅用汉、维两种语言，则因蒙族人在迪化者尚不解汉语，大概都能懂维语。

迪化在阳历十月初即有雪。但十月天气最佳，可说是“寒暖适中”。十二月后始入正常的寒冬，积雪不融，大地冻结，至明年四月初始解冻（有时为三月中旬）。冬季少风，南方冬季西北风怒吼之景象，以我所得短暂之经

马仲英：回族。原为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麒部下一营长。

验而言，在迪化是没有的。然而冬季坐车出门，虽在无风之日，每觉寒风刺面入骨，其凛冽十倍于南方的西北风，此因户外空气太冷之故。室内因有大壁炉，且门窗严闭，窗又为双层，故融暖如春，然而门窗倘有罅缝，则近此罅缝之处，冷风如箭，触之战栗；此亦非风，而因户外空气太冷，冷故重，觅罅隙而钻入，其劲遂似风。室内铺厚毯，亦以防寒气从地板之细缝上侵。关西大汉张仲实素不怕冷，在家时洋服内仅穿毛线衫裤，无羊毛内衣，某日忽觉腿部酸痛，举步无力，此为腿部受寒之征象，然不明寒气从何来；越一日始发见寒气乃从书桌下来，盖书桌下之地毯一角上翘，露出地板之罅缝，寒气遂由此浸润。北方人常言地气冷，故下身所穿必须较上身多为多，必解冻以后，乃可稍疏防范。三月中，有时白天气温颇高，往往见迪化人上身仅穿一单衫而下身仍御厚棉裤。

最冷的日子通常在阴历年关前后；白天为零下二十度，夜间则至四十余度。此为平均的气温。在此严寒的季节，人在户外半小时以上，皮帽、大衣领皮、眉毛、胡须等凡为呼吸之气所能接近之处，皆凝积有薄薄白霜，胡须上往往还挂着小小的冰珠。人多处，远望雾气蒸腾；此亦非雾，而为口气凝成，真所谓“嘘气成云”了。驴马奔驰后满身流汗，出气如蒸笼，然而腹下毛端，则挂有冰球，累累如葡萄，此因汗水沿体而下，至腹下毛端，未及滴落，遂冻结为珠，珠复增大，遂成为冰葡萄。

地冻以后，积雪不融，一次一次雪下来，碾实冻坚，平时颇多坎坷的路面，此时就变成了平坦光滑，比任何柏油路都漂亮。所以北方赶路，以冬季为最好。在这时候，“爬犁”也就出现了。“爬犁”是土名，我们的文绉绉的名称，就是“雪橇”。迪化的“把爷”们，冬季有喜用“爬犁”者。这是无轮的车，有滑板两支代替了轮，车甚小，无篷，能容二人，仍驾以马。好马，新钉一副高的掌铁（冬季走冻结的路，马掌铁必较高，于是马也穿了高跟鞋），拖起结实的“爬犁”，在光滑的冻雪地上滑走，又快又稳，真比汽车有意思。但“爬犁”不宜在城中热闹处走，最好在郊外，在公路上。维族哈族的“把爷”们驾“爬犁”，似乎还是娱乐的意味多，等于上海人在夏天坐车兜风。我有一首歪诗记之：

纷飞玉屑到帘栊，大地银铺一望中；

初试爬犁呼女伴：阿爹新买玉花骢。

北方冬季少霜。如有之，则其浓厚的程度迥非南方人所能想像。迪化冬季亦常有这样的严霜。晨起，忽见马路旁的电线都变成了白绒的彩绳，简直跟圣诞节人们用以装饰屋子或圣诞树的比手指还粗些的白绒彩绳一样。尤其是所有的树枝，也都结起银白的彩来了。远望就同盛开了的银花。如果树多，而又全是落叶树，那么，银白一片，宛如繁花，秋艳的风姿，和盛开的樱花一般——而樱花尚无其洁白。此种严霜，俗名“挂枝”，不知何所取义，或者因其仅能在树枝上见之，而屋面地上反不能见，故得此名。其实霜降普遍，并非独厚于“枝”，不过因为地上屋面皆已积雪，本来是白皑皑的，故遂不觉耳。但因其“挂枝”，遂产生了神话：据说天山最高之博格达峰为神仙所居，有冰肌雪肤之仙女，为怜冬季大地萧条，百花皆隐，故时以晶莹之霜花挂到枝头。此说虽诞，然颇有风趣，因亦记以歪诗一首：

晓来试马出南关，万树银花照两间。

昨夜挂枝劳玉手，藐姑仙子下天山。

照气候说，新疆兼有寒带、温带以及亚热带的气候。天山北麓是寒带，南麓哈密、鄯善一路（吐鲁番因是一个洞，作为例外）是温带，而南疆则许多地方，终年只须穿夹，是亚热带的气候了。但橘、柚、香蕉等，新疆皆不产，或者是未尝试植，或者也因“亚热带”地区，空气太干燥之故，因为这些终年只须穿夹的地方，亦往往终年无雨，饮水、灌田的水，都赖天山的万年雪融化下来供给人们。除了上述数种水果外，在新疆可以吃到各种水果，而尤以瓜、苹果、葡萄、梨、桃为佳。瓜指甜瓜，种类之多，可以写成一篇文章；“哈密瓜”即甜瓜之一种，迪化人称为甜瓜，不称为哈密瓜。这是大如枕头的香瓜，惟甜脆及水分之多，非南方任何佳种香瓜所可及。此瓜产于夏初，窖藏可保存至明年春末；新疆人每谓夏秋食此瓜则内热，惟冬日食之则“清火”。苹果出产颇多，而伊犁之二台所产最佳，体大肉脆，色味极似舶来的金山苹果，而香过之。二台苹果熟时，因运输工具不够，落地而腐烂于果林中者，据云每每厚二三寸，在伊犁，大洋一元可购百枚；惟运至迪化，则最廉时亦须二三毛一个。

梨以库车及库尔勒所产最佳，虽不甚大，而甜、脆、水分多，天津梨最好者，亦不及之。梨在产地每年腐烂于树下者亦不可胜计，及运至迪化，则每元仅可得十枚左右。南疆植桑之区，桑椹大而味美，有黑色白色两种；惟此物易烂，不能运至他处。据言当地维族人民之游手好闲者，每当桑椹熟时，即不工作，盖食桑椹亦可果腹；桑椹在产地，人可随意取食，恣意饱啖，无过问者。

初到哈密，见有“定湘王”庙，规模很大，问了人，才知这就是城隍庙。但新疆的城隍何以称为“定湘王”，则未得其解。后来又知道凡汉人较多的各城市中都有“定湘王”庙，皆为左宗棠平定新疆以后，“湖湘子弟”所建；而“定湘王”者，本为湖南之城隍，左公部下既定新疆，遂把家乡的城隍也搬来了。今日新疆汉族包含内地各省之人，湘籍者初不甚多，然“定湘王”之为新疆汉族之城隍如故。

迪化汉族，内地各省人皆有，会馆如林，亦各省都有；视会馆规模之大小，可以约略推知从前各该省籍人士在新省势力之如何。然而城隍庙则仅一个，即“定湘王庙”是也。每年中元节，各省人士追荐其远在原籍之祖先，“定湘”庙中，罗天大醮，连台对开，可亘一周间。尤为奇特者，此时之“定湘王”府又开办“邮局”，收受寄给各省籍鬼魂之包裹与信札；有特制之“邮票”乃“定湘王府”发售，庙中道士即充“邮务员”，包裹信札寄递取费等差，亦模拟阳间之邮局；迷信者以为必如此然后其所焚化之包裹与信札可以稳度万里关山，毫无留难。又或焚化冥镪，则又须“定湘王府”汇兑。故在每年中元节，“定湘王府”中仅此一笔“邮汇”收入，亦颇可观。

昔在南北朝时，佛法大行于西域；唐初亦然，读三藏法师《大唐西域记》已可概见。当时大乘诸宗皆经由西域诸国之“桥梁”而入东土，其由海道南来者，似惟达摩之南宗耳。但今日之新疆，则除蒙族之喇嘛外，更无佛徒。汉人凡用和尚之事，悉以道士代之。丧事中惟有道士，而佛事所有各节目，

甜瓜：即南方所谓香瓜。——作者注

仪式多仍其旧，惟执行者为道士而已。蒙族活佛夏礼瓦圆寂于迪化，丧仪中除有喇嘛诵经，又有道士；省政府主席李溶之丧，道士而外，亦有喇嘛数人。

伊斯兰教何时始在新疆发展而代替了从前的佛教，我没有作过考据，然而猜想起来，当在元明之交。道士又在何时代行和尚职权，那就更不可考了，猜想起来，也许是在清朝季世汉人又在新疆站定了脚跟的时候。但当时何以不干脆带了和尚去，而用道士，则殊不可解，或者是因为道士在宗教上带点“中间性”罢？于此，我又连带想起中国历史上宗教争论的一段公案。南北朝时，佛法始来东土，即与中国固有之道教发生磨擦，其间复因北朝那些君主信佛信道，时时变换，以至成为一件大事。但自顾欢、慧琳、僧绍、孟景翼等人一场无聊的争论以后，终于达到“三教”原是“一家”的结论；然而这种论调，也表示了道教在当时不能与佛教争天下，故牵强附会，合佛道为一，又拉上孔子作陪，以便和平共处；故当时释家名师都反对之。不谓千年以后，伊斯兰教在西域既逐走佛徒，和尚们遗下的那笔买卖，居然由道士如数顶承了去，思之亦堪发噱。

然道士在新疆，数目不多，迪化城内恐不满百，他处更无足论。普通人丧事，两三个道士便已了事。此辈道士，平日几与俗家人无异。

新疆汉族商人，以天津帮为巨擘。数百万资本（抗战前货币之购买力水准）者，比比皆是。除迪化有总店，天津有分庄而外，南北疆之大城市又有分号。新疆之土产经由彼等之手而运销于内地，复经由彼等之手，内地工业品乃流入于新疆。据言此辈天津帮商人，多杨柳青人，最初至新省者，实为左宗棠西征时随军之负贩，当时称为“赶大营”。左西征之时，旷日持久，大军所过，每站必掘井，掘井得水必建屋，树立小小之市集，又察各该处之土壤，能种什么即种什么。故当时“赶大营”者，一挑之货，几次转易，利即数倍，其能直至迪化者，盖已颇有积累。其魄力巨大者，即由行商而变为坐庄。据言此为今日新疆汉族巨商之始祖。其后“回疆”既定，“赶大营”已成过去，仍有“冒险家”画依样之葫芦，不辞关山万重，远道而往，但既至镇西或迪化，往往资斧已罄，不能再贩土产归来，则佣工度日，积一二年则在本地为摊贩，幸而获利，足可再“冒险”矣，则贩新省之土产，仍以行商方式回到天津，于是换得现钱再贩货赴新省；如此每年可走一次，积十年亦可成富翁，在迪化为坐庄矣。但此为数十年前之情况，如此机会，早成过去。

抗战前，新省对外商运孔道，为经镇西而至绥边，有绥新公路，包头以东则由铁路可抵天津；此亦为新疆多天津商人之一因。抗战后，绥新公路为新省当局封锁，表面理由是巩固边防。目前新省对外商运，已经有组织地集中于官商合办之某某土产公司之手，情况又已不同。

博格达山为天山之最高峰。清时初定天山南北路后，即依前朝故事，祭博格达山。据《新疆图志》，山上最古之碑为唐代武则天所立。其后每年祀典，率由地方官行之，祭文亦有定式，《新疆图志》载之。

博格达山半腰有湖（俗称海子），周围十余里，峭壁环绕，水甚清，甚冷；此处雪线之下，故夏季尚可登临，自山麓行五十余里即到。自此再上，则万年雪封锁山道，其上复有冰川，非有特别探险装备，不能往矣。山巅又有一湖，较山腰者为大。当飞机横越天山时，半空俯瞰，此二湖历历可睹，明亮如镜。《新疆图志》谓山上积雪中有雪莲，复有雪蛆，巨如蚕，体为红色，云可合媚药。二十九年夏，有友登博格达，在山腰之湖畔过一宿，据云

并不见有雪莲雪蛆，亦无其他奇卉异草，珍禽瑞兽，惟蚊虫大而且多，啮人如锥刺耳。湖边夜间甚冷，虽当盛夏，衣重裘尚齿战，乃烧起几个火堆，卧火旁，始稍得寐。又山腰近湖处有一庙，道士数人居之，不下山者已数年，山下居民每年夏季运粮资之，及秋，冰雪封山，遂不通闻问，俟来年夏季再上山探之。在全疆，恐惟此数道士为真能清苦。诗以记之：

博格达山高接天，云封雪锁自年年。

冰川寂寞群仙去，瘦骨黄冠灶断烟。（其一）

雪莲雪蛆今何在？剩有鬻蚊逐队飞。

三伏月圆湖畔夜，高烧篝火御寒威。（其二）

雪莲有无，未能证实，然天山峭壁生石莲，则余曾亲见。离迪化约百余公里，有白杨沟者，亦避暑胜地，余曾往一游。所谓“白杨沟”，实两山间之夹谷耳，范围甚大，汽车翻越数山始到其地。此为哈族人游牧地，事前通知该管之“千户长”，请彼导游，兼代备宿夜处。“千户长”略能汉语，备马十余匹，请客人作竟日之游，出“白杨沟”范围，直抵焉耆境之天山北麓。途次经过一谷，两岸峭壁千仞，中一夹道长数里，山泉潺潺，萦回马足；壁上无草木，惟生石莲。此为横生于石壁之灌木，叶大如掌，形似桐叶，白花五六瓣甚巨，粗具莲花之形态，嗅之有浓郁之味，似香不香，然亦不恶。询之“千户长”可作药用否？渠言未知可作何用，惟哈族人间或以此为催生之剂，煎浓汤服。石莲产于深谷，盖不独白杨沟有之。

夏季入山避暑，宿蒙古包，饮新鲜马乳，是新疆摩登乐事。但亦游牧民族风尚之残余。维、哈两族之“把爷”每年夏季必率全家男女老小，坐自家之大车，带蒙古包、狗，至其羊群所在之山谷，过一个夏季的野外生活。秋凉归来，狗马皆肥健，毛色光泽如镜面，孩子们晒成古铜色，肌肉结实。

马乳云可治肺病胃病；饮了一个夏季的马乳，据云身必健硕，体重增加。但此恐惟在山中避暑饮之，方有效验；盖非马乳之独擅神效，亦因野外生活之其他有益条件助成之也。维、哈族人善调制马乳，法以乳盛革囊中，摇荡多时，略置片刻，又摇之，如是数回，马乳发酵乃起沫，可食。味略酸而香冽，多饮觉微醺；不嗜酒者饮马乳辄醉。初饮马乳者，常觉不惯，然经过一时期，遂有深嗜，一日可进十数大碗，而饭量亦随之增加。然马乳新鲜者，城中不易得。马肉制之腊肠，俗名马肠子，维、哈、蒙等族所制者甚佳。据云，道地之马肠子，乃用马驹之肉，灌入肠管后挂于蒙古包圆顶开口通风之处，在风干之过程中，复赖蒙古包中每日自然之烟熏，——盖包中生火有烟，必从顶上之孔外出也。马肠子佳者，蒸熟后色殷红，香腴不下于金华火腿。避暑山中者，倘能骑马爬山，饮马乳，食馕（一种大饼），佐以自制之奶皮（即牛乳蒸热后所结之奶皮）、草莓果酱、马肠子、葡萄，睡蒙古包，则空气、阳光、运动、富于养分之饮食，一切都有，对于身体的益处是不难想像的！

维族哈族人有嗜麻烟者，犹汉族人之嗜鸦片。麻烟比鸦片更毒，故在新省亦悬为厉禁。麻烟自印度来，原状不知如何，但供人吸用者则已为粉状，可装于荷包中，随时吸食。因其简易，为害更烈。

食麻烟后，入半醉状态，即见种种幻象；平日想念而不可多得之事物，此时即纷陈前后，应接不暇。嗜钱财者即见元宝连翩飞来，平常所未曾见而

但闻其名之各种珍宝，此时亦缤纷陆离，俯拾即是；好色之徒则见粉白黛绿，围绕前后，乃至素所想念之良家子亦姗姗自来，偎身俯就。人生大欲，片刻都偿，无知之辈，自当视为至乐。旁人见食麻烟者如醉如痴，手舞足蹈，以为癫疯，而不知彼方神游于极乐幻境也。既而动作停歇，则幻境已消，神经麻痹而失知觉。移时始醒，了无所异，与未吸食同。

然而多次吸食之后，即可成瘾；瘾发时之难受，甚于中鸦片毒者。同时，肺部因受毒而成哮喘之病，全身关节炎肿，毒入脊髓，伛偻不能挺立，不良于行；到这阶段，无论再食与否，总之是去死不远了。

维哈族人之嗜赌博者，以羊骨为博具，掷地视骨之正反，以定输赢。据说他们结伴贩货从甲地至乙地，在途中往往于马背上且行且赌，现金不足，则以货物作抵押，旅途未终，而已尽丧所有，则转为博进者之佣工，甚至以佣工若干年作为赌注而作最后之一掷者。

维吾尔（元史称畏兀儿）族人口占全疆总人口之半数，南疆居民，什九为维族。奉伊斯兰教。旧时阿訇（教中长老）集政教大权于一身，教长同时即为一部落或一区域之行政首长。今则阿訇惟掌教，不复能过问地方行政矣。维族人兼营商业，游牧，及农业；手工业（如裁缝、木匠、泥水、织毯等）亦多彼族中人。南疆所产之绸，色彩鲜艳，图案悦目，亦多为维族工人所织造。

在文艺美术方面，维族人具有天才，土风歌舞，颇具特色，此不赘言。尝观一出由民间故事改编之短剧，幽默而意味深长，实为佳作。此种民间故事，大都嘲笑富而不仁之辈。短剧内容，写一富人路遇一穷人，穷人向彼行乞，富人不应，且骂之。既而同憩于路侧，穷人徐问富人何来，将赴何处，且进以谀词。富人大喜，乃夸其家宅之美，夸其子，夸其骆驼，终乃夸其所爱之狗。穷人随机应变，亦盛赞其房屋之美轮美奂，其子之多才多艺，其骆驼之健硕，其狗之解人意。富人大喜。穷人乃乘间复请周济。富人怫然掉头不顾。二人于是无言。富人解行囊，取馕食之，不能尽，则以所余投畀路旁一野犬，穷人至是复乞分一小块馕，富人仍不肯，谓宁投畀狗食，不与汝懒虫，荷囊而起，将行。穷人忽思得一计，遂追语之曰：你不是有一条很好的狗么？我适从你家乡来，见你的狗已死。富人大惊，问故。穷人曰：因为你的狗吃了你那匹骆驼的肝，所以死了！富人更惊，复问骆驼何故致死。穷人曰：因为你的儿子死了，你的妻杀骆驼以祭你子。富人惊极而号哭，复问子何因死。穷人曰：因为你的家中失火，你的儿子被烧死了。至是，富人大哭，捶胸捋发，如中风狂，尽弃其行囊，并自褫其衣，呼号痛哭而去。穷人大喜，乃尽取富人之行囊、衣物，坐于道旁，从行囊中取馕食之，未尽一枚，而富人已大呼而来，指穷人为偷儿，夺还各物，且将夺其手中之余馕。穷人急逃，富人追之，幕遂下。维族风俗，杀骆驼致祭，乃最郑重之典礼，又谓狗食骆驼肝必死。

维族乐器，有长颈琵琶（四弦）、鼓、箫、琴（铜丝之弦甚多，而以小竹片鼓之，广东人亦常用之，称为洋琴）等数事。所谓长颈琵琶者，实似一曼陀铃，而颈特长，在三尺以上；意谓当别有名，但曾询翻译人哈美德，则云是琵琶。或者吾人今日习见之琵琶已经汉化乎。

维族人席地而坐。炕之地位占全室过半有强，或竟整个房间是一大炕，炕上铺毡，毡上更有大坐垫。有矮几，或圆或长方。维族人上炕坐时，足上仍御牛皮软底靴，实则此为袜子；下炕则加牛皮鞋，无后跟，与吾人之拖鞋

相仿，出门亦御此鞋。长袍左衽，无钮扣，腰束以带。头上缠布，或戴无帽结之瓜皮小帽，帽必绣花，而甚小，仅覆头顶之一部。至于戴打乌帽，穿长统靴，则已为欧化之结果。哈族人装束相同。两族女子平日亦穿靴。

日常饮食，为牛乳、羊肉、馕、奶皮、酥油、水果、红茶，而红茶中例必加糖。菜肴中甚少菜蔬。待客，隆重者宰一羔羊，白煮，大盘捧上，刀割而食。主人倘割取羊尾肥脂以手塞客人口中，虽系大块，客人须例张口承之，不得以手接取徐徐啣食，更不得拒而不受。盖此为主人敬客之礼，不接受或不按例一口吞下者即为失礼。客人受后，例须同样回敬主人。

所谓“抓饭”者，乃以羊油蒸饭，又加羊肉丁与胡萝卜（黄色）丁子；因其非羊油炒饭，而为蒸饭，故虽似炒饭而味实不同。俄国风之“萨莫伐”在新疆颇为流行，有钱之维族人家家都置一具。盖嗜饮红茶，维哈及其他各民族皆然也。

新疆十四民族，除汉族外，维族兼营农业、商业、牧畜、手工业，已如上述。蒙族及哈族则以游牧为主。哈族在北疆居近汉人众多之大城市者，亦种地，惟视为副业；种地不施肥，用休耕制，下种后即自驱羊入山，不复一顾，待秋收时再来收割，有多少算多少。据闻南疆维族人之养蚕者，亦如我们之养野蚕然，蚕置桑树上，即不复措意，蚕及时成茧，亦在树上。此因南疆气候温和又无雨，故得如此便宜省事也。蒙族多逐水草而游牧，故小学亦设蒙古包中，跟着他们一年迁徙数次。

余如柯尔克孜、泰兰其、泰吉克、塔塔尔等族，本皆为中亚细亚民族，今在苏联中亚境内亦有诸族；然此诸族在新省者尚多在游牧阶段。锡伯、索伦二族，乃乾隆年间由满洲移往，今多居伊犁一带，人数不多，亦为农牧兼营者，仍保存其自族之语言，然能汉语及维语者甚多。人谓此族人习语言，特有天才。

据说南疆之罗布淖尔尚有最原始之小部落在焉。此为水上居民，住罗布淖尔中，与其他人民几无往来，不知牧畜，惟恃捕取罗布淖尔之鱼介为食；人数无确计，度不过数百人而已。罗布淖尔在南疆大戈壁之一端，塔里木河注入之；此一带为其他民族所不到，故此小小部落尚能自生自息，保留其原始状态。

游牧民族多喜养狗，盖警卫羊群，管束羊群，皆有赖于狗。而庞大骆驼队中亦必有狗若干头任巡哨纠察之责。新省之游牧民族既多来自他处，来时携狗自随，是故新省之狗，种类亦甚多。大概而言，有蒙古种、西藏种、各式中亚种，及此诸种之混血种，凡此皆为帮人办事的狗。再加以汉人豢畜供玩弄之叭儿种，形形色色，不可究诘；我尝戏语，狗与甜瓜在新省种类之多，恐甲于全国。

迪化人家，几乎家家有狗。此种狗，半为供玩弄而豢养。自南梁（即南郊）至城门之一段路上，群狗竟分段而“治”。倘有他段之狗走过其“地盘”，必群起而吠逐之，直至其垂尾逃出“界线”而后已。因此，狗的行动范围，颇受限制，除非跟了主人同走。然此种无理取闹的狗们，都为叭儿种或其混血种；至于禀有“帮人办事”的天性的猎狗族类，则无此习气。

野羊又名黄羊，毛直而长，佳者可以麝入狐坎中混充狐之腹皮。黄羊跳

“萨莫伐”：俄语 *самовар* 的音译，即茶炊。

淖尔：蒙语，即湖泊。——作者注

走甚速，在无边之戈壁滩上，虽小跑车亦不能追及之。黄羊肉又甚鲜美。猎黄羊须用合围之法，侦得其群居之处，四面包围击之；若二三人出猎，往往不能有所得。盖黄羊甚为机警，目力甚好，人在二三里外，黄羊即见之。

迪化是省会，饮食娱乐之事，自然是五花八门的了。汉族人开的酒馆，大抵是混合了山东、陕西、天津各帮烹调的手法，可以“北方菜”目之，然厨子则多甘肃籍。城里有一家自称“川菜馆”的，据试过的人说，毫无川菜风味；或亦可说，仅在菜单上看得见川菜风味。至于官场大宴会，倘用中菜，还是“北方味”的馆子来承办，可异者竟有烧烤乳猪，而且做得很好。但挂炉鸭子则从未见过，简直绝对不用鸭子，有时用鹅。冷盆极多。倘是一席头等的菜，所用冷盆多至二三十个，圆桌面上排成一圈。这许多冷盆，例必杂拌而食之，故有一大盘居中，为拌菜之用。冷盆中又必有“龙须菜”一味，此为海菜。亦有海参，则为苏联货。有鱼翅。此外各种海味则因抗战后来源断绝，已不多见。乌鲁木齐河中产一种鱼，似属鲑鱼一类，尚为鲜美，此为迪化唯一可得之鲜鱼。

“汉菜”而外，有清真教门馆与俄国式西菜。

娱乐之事，除各种晚会外，惟有电影与旧戏。电影院皆为各族文化促进会所办之俱乐部所附设，苏联片为多，国产片仅抗战前的老片子偶有到者。

旧戏园有五六家，在城内。主要是秦腔，亦有不很纯粹之皮黄。故李主席寿辰，曾在省府三堂演旧戏；据说这是迪化最好的班子，最有名的角儿，所演为皮黄。但我这外行人看来，也已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汉族小市民喜听秦腔。城内几家专唱秦腔的戏园，长年门庭如市。据说此等旧戏园每三四十分钟为一场，票价极低，仅省票（新省从前所通用之银票，今已废）五十两（当时合国币一分二厘五），无座位，站着看，屋小，每场容一百余人即挤得不亦乐乎；隆冬屋内生火，观戏者每每汗流浹背，幸而每场只得三四十分钟，不然，恐怕谁亦受不住的。电影票价普通是五毛三毛两种，座位已颇摩登。然因所映为苏联有声片，又无翻译，一般观众自难发生兴味，基本观众为学生与公务员。

电影院戏园皆男女分座。此因新省一般民众尚重视男女有别之封建的礼仪也。但另一方面，迪化汉族小市民之妇女，实已相当“解放”；妇女上小茶馆、交男友，视为故常，《新疆日报》所登离婚启事，日有数起，法院判离婚案亦宽，可谓离婚相当自由。此等离婚事件之双方，大都为在戏园中分坐之小市民男女。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对照。归化族（即白俄来归者）之妇女尤为“解放”，浪漫行动，时有所闻，但维哈等族之妇女就不能那么自由了，因为伊斯兰教义是不许可的。然又闻人言南疆库车、库尔勒等地风气又复不同，维族女子已嫁者，固当恪守妇道，而未嫁或已寡者，则不以苟合为不德云。

〔附记〕此篇大概写于一九四〇年冬或一九四一年初夏，后来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之《旅行杂志》。我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出新疆，到延安住了几个月，于同年初冬到重庆。那时候，重庆的朋友们正担心着杜重远和赵丹等人的安全（我离新疆时，杜已被软禁，赵等尚未出事，后来在延安，知道杜、赵等皆被监禁，罪名是勾通汪精卫，无人置信；足见盛世才实在不能从杜、赵的言行中找到其他借口，只好用这个无人相信的莫须有罪名来逮捕他们），纷纷向我探询新疆实况；我的回答是很率直的，我揭穿了盛世才的假面具。有一次，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多人（其中有好几位是很进步的）找我谈新疆情形，

由龚澎同志介绍，并任翻译；谈完以后，有一位记者问我能不能发表？我回答，可以用背景材料的形式发表，不要用访问记的形式。为什么我这样回答？原因是，一、当时我正和沈老（钧儒）、郭老（沫若）及韬奋，一同写信给盛世才，要求释放杜、赵等七、八人，如果发表了我暴露盛世才的访问记，就会影响到营救杜、赵等人的工作；二、当时盛世才的亲俄联共（中共）的假面具还戴着，盛和蒋介石还有矛盾，公开暴露盛，还不到时候。但是，另一方面，我以为盛世才的欺诈行为对后方（指那时的重庆、成都、昆明等地）青年知识分子所起的欺骗作用（特别因为两年前杜重远为盛所欺，写了两本小册子，歌颂盛世才，造成了许多青年对盛的极大幻想），有加以消解的必要。由于上述的考虑，我写了这篇《新疆风土杂忆》。但发表时，有些字句被国民党检查官或删或改，歪曲了原来面貌。此文后来收在《见闻杂记》单行本时，我又作修改，但不知何故，单行本印出来时仍然是《旅行杂志》发表时的样子。现在冷饭重炒，字句上我再作小小的修改。

此篇所述新疆的风土习俗，在今天看来，已成陈迹。但从这里也可以对照出来，解放后的新疆的工业、农业、文化教育事业的飞快发展，真是一日千里，史无前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正确政策和英明领导的实例之一。

1958年11月16日，茅盾记于北京

（原载1942年9、10月《旅行杂志》16卷9、10期）

回忆是辛酸的罢，然而只
有激起我们的奋发之心！

辛亥年的上半年，我在湖州府中学读书。校长是沈谱琴先生，但那半年，由钱念劬（恂）先生来代了。放暑假以前，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剪辫运动也波及到这个中学校。同学之中剪去了两三对辫子。为什么是“对”呢？因为那时辫子的剪掉是两人一对以“你剪我也剪”的比赛或打赌的方式完成了的，所以不剪则已，剪必成对。

那时我们并未尝闻革命大义。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轰轰烈烈的几次失败的起义，我们都不知道。国文教员要是喜欢古文的，就教我们古文；喜欢骈体的，就教骈体。我们对于“国家大事”，实在知道的很少很少。但是对于辫子的感情却不好，我们都知道这是“做奴隶的标帜”。因此，倘有一人对另一同学“下战书”说：“你若剪掉，我也剪”，那位被挑战的人便也毅然答道：“你敢剪，难道我不敢剪么？”于是在两方都不肯示弱，都不肯自认甘为奴隶的相持局面下，两条辫子就同时剪掉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各中学的剪辫子风潮，大概就是下半年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奏罢。

那年暑假后，我就转入嘉兴府中学读书了。

嘉兴府中学的校长是方青箱先生，教员中间有好几位是“革命党”。就剪辫子的同学也比湖州中学多了几个，而尤以我所在的三年级为最多。旧时五年制的中学校内，往往以三年级生为最喜“闹事”，似乎剪辫子也不能不首推三年级了。可是嘉兴府中学的同学也是未闻革命大义的，教员虽多“革命党”，可是有的是教几何的，有的是教代数的，理化的。我们对于朱希祖先生所教的《周官考工记》，以及阮元的《车制考》，实在感到头痛，对于马幼渔先生的《左氏春秋传》，也不大起劲，而且因为几何代数程度特别提高，差不多全副精力都对付这两门功课去了。

以我所经历过的三个中学而言（最后我还进过杭州的安定中学），那时的嘉兴府中学校算是民主空气最浓厚的，师生之间，下了课堂便时常谈谈笑笑，有时亦上街吃点心，饮茶。那年中秋，我们三年级的几个同学，便买了些水果、月饼、酱鸡、熏鱼，还有酒，打算请三位相熟的教员共同在校中阳台上赏月。不料一位教几何的先生病了，教代数的先生新婚，自然要在家和新师母赏月，只有一位体操教员赏光。然而我们还是玩得很尽兴，差不多每个人都喝半醉。

我特别记得这一回事，因为以后不久，又一件使我们兴奋得很的事发生了，便是武昌起义。

虽然我们那时糊涂得可笑，只知有“革命”二字，连中国革命运动史的最起码的常识也没有。我们不知道在这以前，有过那些革命的党派，有过几次的壮烈的牺牲，甚至连三民主义这名词也不知道，然而武昌起义的消息把我们兴奋的不得了。我们无条件的拥护革命，毫无犹豫地相信革命一定会马上成功。全校同学以自修室为单位，选派了同学，每天两三次告假出校，到东门火车站从上海来的旅客手里买当天的上海报，带回校里贴在墙上。买报的同学常常要上车去向乘客情商，方才买得，可是大家用竞赛的精神去干，好像这也就是从事革命了。

革命军胜利的消息，我们无条件相信；革命军挫败的消息，我们说一定

是造谣。

为什么我们会那样盲目深信？我们并不是依据了什么理论，更不是根据什么精密研究过的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对比；我们所以如此深信，乃是因为我们目击身受满清政府政治的腐败，民众生活的痛苦，使我们深信这样贪污腐化专横的政府，一定不能抵抗顺应民众要求的革命军。

这一个真理，我将永远深信！

几何、代数、《考工记》、《左氏春秋传》都没有心思去读了。成天忙的是等报来、看报。然而可怜得很，我们的常识太缺乏，我们不能从报上看出革命军发展得怎样，我们是无条件相信胜利必然是“我们的”罢了。

不久，学校放假。这是临时假。我们几个同乡的一回到家乡，就居然以深通当前革命情势的姿态，逢人乱吹，做起革命党的义务宣传来了。虽然是不通火车的镇，但上海报隔日亦可到。一般的小市民都默认革命党之成大事已无疑问，然而最担心者是地方治安。因为，据他们看来，绿营兵老枪二十三名逃了以后，革命军倘还不来，则土匪之窃发是可虑的。于是办保卫团之议便渐渐成熟，这倒是真真的小市民义勇性质的商团，服装枪械自备。但后来革命既已成功，这也就解散了。

大概是阴历十一月中，大局底定，嘉兴府中学又重复开学。再到校上课时，老教员已经走了大半，新来一学监又说要整顿校风，师生之间的民主空气大不如前，终于在寒假大考以后，三年级我们几个同学还有别级的几个“不安分”的同学，在校里也起了一次小小革命，——毫无原则，专和那位学监捣乱一场，就一哄而散，各自回家。从此我们也被革出这嘉兴府中学。

这些事情，现在想起来，尚历历如在目前，那时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当真浅薄得可笑，然而或许也还幼稚得可爱罢？于今又三十年了，三十年中，旧侣星散，早已音问久断，然而我相信这三十年中的几次大变革，当亦是同样的经过来的罢，自然，各人的感应不能像三十年前那次那样相同的了。中国的革命是艰苦而冗长的过程，在抗战第六年的今天来回忆以往的种种，多少烈士的热血和头颅，无数千万民众的痛苦与牺牲，然后把中华民国的招牌撑到今天，然后把一代一代的青年教育培养成革命的继承人，而尤其把这艰苦的抗战撑拄到而今，这是辛酸的罢，但只有激起我们的感奋，只有加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为求民族自由解放的抗战必得最后的胜利，中国的革命大业最后必得全部完成。

这回忆是辛酸的罢，然而只有激起我们的奋发之心！有一朝，我们能够以愉快的心情再作这回忆，我想，这也不会很远的罢？然而，能以愉快的心情，来热烈庆祝这大节目的恐怕是我们下一代的儿孙。在我们这一代，恐怕笑颜之下总不免有辛酸。为的是我们是从血泊中来，我们亲眼看见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所流的血，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回忆是辛酸的罢，然而只有激起我们的奋发之心！

1943 年

（原载 1942 年 10 月 10 日桂林《大公报·文艺》201 期）

忆冼星海

和冼星海见面的时候，已经是在听过他的作品（抗战以后的作品）的演奏，并且是读过了他那万余言的自传（？）以后。（这篇文章发表在延安出版的一个文艺刊物上，是他到了延安以后写的。）

那一次我所听到的《黄河大合唱》，据说还是小规模，然而参加合唱人数已有三百左右；朋友告诉我，曾经有过五百人以上的。那次演奏的指挥是一位青年音乐家（恕我记不得他的姓名），是星海先生担任鲁艺音乐系的短短时期内训练出来的得意弟子；朋友又告诉我，要是冼星海自任指挥，这次的演奏当更精彩些。但我得老实说，尽管“这是小规模”，而且由他的高足，代任指挥，可是那一次的演奏还是十分美满；——不，我应当承认，这开了我的眼界，这使我感动，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对于音乐，我是十足的门外汉，我不能有条有理告诉你：《黄河大合唱》的好处在哪里。可是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像灵魂洗过澡似的。

从那时起，我便在想像：冼星海是怎样一个人呢？我曾经想像他该是木刻家马达（凑巧他也是广东人）那样一位魁梧奇伟，沉默寡言的人物。可是朋友们又告诉我：不是，冼星海是中等身材，喜欢说笑，话匣子一开就会滔滔不绝的。

我见过马达刻的一幅木刻：一人伏案，执笔沉思，大的斗篷显得他头部特小，两眼眯紧如一线。这人就是冼星海，这幅木刻就名为《冼星海作曲图》。木刻很小，当然，面部不可能如其真人，而且木刻家的用意大概也不在“写真”，而在表达冼星海作曲时的神韵。我对于这一幅木刻也颇爱好，虽然它还不能满足我的“好奇”。而这，直到我读了冼星海的自传，这才得了部分的满足。

从冼星海的生活经验，我了解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有这样大的气魄。做过饭店堂倌，咖啡馆杂役，做过轮船上的锅炉间的火伕，浴室的打杂，也做过乞丐，——不，什么都做过的一个人，有两种可能：一是被生活所压倒，虽有抱负只成为一场梦，又一是战胜了生活，那他的抱负不但能实现，而且必将放出万丈光芒。“星海就是后一种人！”——我当时这样想，仿佛我和他已是很熟悉的了。

大约三个月以后，在西安，冼星海突然来访我。

那时我正在候车南下，而他呢，在西安已住了几个月，即将经过新疆而赴苏联。当他走进我的房间，自己通了姓名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呀，这就是冼星海么！”我心里这样说，觉得很熟识，而也感得生疏。和友人初次见面，我总是拙于言词，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而在那时，我又忙于将这坐在我对面的人和马达的木刻中的人作比较，也和我读了他的自传以后在想像中描绘出来的人作比较，我差不多连应有的寒暄也忘记了。然而星海却滔滔不绝说起来了。他说他刚出来，就知道我进去了，而在我还没到西安的时候就知道我要来了；他说起了他到苏联去的计划，问起了新疆的情形，接着就讲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我对于音乐的常识太差，静聆他的议论，（这是一边讲述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计划，一边又批评自己和人家的作品，表示他将来致力的方向，）实在不能赞一词。岂但不能赞一词而已，他的话我记也记不全呢。可是，他那种气魄，却又一次使我兴奋鼓舞，和上回听到

《黄河大合唱》一样。拿破仑说他的字典上没有“难”这一字，我以为冼星海的字典上也没有这一个字。他说，他以后的十年中将以全力完成他这创作计划；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

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因为他不但有坚强的意志和伟大的魄力，并且因为他又是那样好学深思，勇于经验生活的各种方面，勤于收集各地民歌民谣的材料。他说他已收到了他夫人托人带给他的一包陕北民歌的材料，可是他觉得还很不够，还有一部分材料（他自己收集的）却不知弄到何处去了。他说他将在新疆逗留一年半载，尽量收集各民族的歌谣，然后再去苏联。

现在我还记得的，是他这未来的《民族交响乐》的一部分的计划。他将从海陆空三方面来描写我们祖国山河的美丽，雄伟与博大。他将以“狮子舞”、“划龙船”、“放风筝”这三种民间的娱乐，作为他这伟大创作的此一部分的“象征”或“韵调”。（我记不清他当时用了怎样的字眼，我恐怕这两个字眼都被我用错了。当时他大概这样描写给我听：首先，是赞美祖国河山的壮丽，雄伟，然后，狮子舞来了，开始是和平欢乐的人民的娱乐，——这里要用民间“狮子舞”的音乐，随后是狮子吼，祖国的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了。）他也将从“狮子舞”、“划龙船”、“放风筝”这三种民族形式的民间娱乐，来描写祖国人民的生活、理想和要求。“你预备在旅居苏联的时候写你这作品么？”我这么问他。“不！”他回答，“我去苏联是学习，吸收他们的好东西。要写，还得回中国来。”

那天我们的长谈，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谁又料得到这就是最后一次呵！“要写，还得回中国来！”这句话，今天还在我耳边响，谁又料得到他不能回来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写这小文的时候还觉得我是在做恶梦。

我看到报上的消息时，我半晌说不出话。

这样一个人，怎么就死了！

昨晚我忽然这样想：当在国境被阻，而不得不步行万里，且经受了生活的极端的困厄，而回莫斯科去的时候，他大概还觉得这一段“僥来”的不平凡的生活经验又将使他的创作增加了绮丽的色彩和声调；要是他不死，他一定津津乐道这一番的遭遇，觉得何幸而有此罢？

现在我还是这样想：要是我再遇到他，一开头他就会讲述这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且要说，“我经过中亚细亚，步行过万里，我看见了许许多多，我得了许多题材，我作成了曲子了！”时间永远不能磨灭我们在西安的一席长谈给我的印象。

一个生龙活虎般的具有伟大气魄，抱有崇高理想的冼星海，永远坐在我对面，直到我眼不能见，耳不能听，只要我神智还没昏迷，他永远活着。

1946年1月5日

（原载1946年1月28日《新文学》2号）

“僥来”：意外得来的意思，语出《庄子·缮性》。

梯俾利斯的“地下印刷所”

梯俾利斯（乔治亚共和国京城）市外，有一座小小的平房，这便是1914——1916年斯大林及其同志们所经营的“地下印刷所”。到梯俾利斯观光的人们一定要瞻仰这革命的遗迹，“来宾题词册”上写满了各种文字的赞辞。

和附近的一般民房并没有什么差别，这平房前面的院子围着半人高的木栅，进了栅门，左首是一间很小的独立的披屋，内有一口井；正屋在右首，和披屋不相连，并排两间（每间约一方丈之大），前有走廊。正屋下层，那是一半露在地面的地窖，有小梯可达，从前这是作为厨房及堆积杂物的，现在还照当年的形式摆着炉灶和各种厨房用具。

正屋，厨房（一半在地面的地窖），有一口井的披屋，这一切都是四十年前梯俾利斯的小市民住宅的标准式样；那么，当年的秘密印刷机就装在这三间屋子里么？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不说沙皇的宪兵和警察全是瞎子和聋子了。秘密印刷机是在这房子的地下。所以这一个“地下印刷所”名副其实是在“地下”。在当年，那两间正屋都是住人的。靠左首的那一间，住着一位名叫腊却兹·蒲萧列兹的女子，她常常坐在窗前做女红，人家在木栅门外就可以望见她。右首的那一间住着屋主罗斯托玛乞维列，一位规规矩矩的市民。这两间正屋里当然一无秘密可藏，更不用说庞大的印刷机了。正屋之下就是作为厨房和杂物堆放处的地窖。那时的小市民住宅都有这样一个地窖，空空洞洞的一间，这里也藏不了什么秘密。地窖是泥地——正规的泥地，连一个老鼠洞也找不出来的。

再看披屋。这里有一口井，如果放下吊桶去，当然可以汲取水上来。这是一口规规矩矩的井。四十年前梯俾利斯的小市民住宅差不多家家都有这样一口井。

然而秘密可就在这井内。

如果你用手电筒照着细细看，你会发见井的内壁并不怎样光滑，这边那边，有些极小的窝儿；如果再仔细查看，这些窝儿的位置自上而下，成为不规则形的两行，直到井底。你要是愿意试试，下了井口，用脚尖踩着那些窝儿，就像走梯子似的一步一步可以走到井底。但是一口井的内壁而有这样的梯形窝儿，也并不为奇；掘井的工人就是踏着这些窝儿这样上来下去进行他的工作的。四十年前梯俾利斯的水井差不多全有这样的梯形窝儿。可是，正在这样平平常常不足为奇之中，有它的秘密。

你如果踏着那些梯形窝儿下井去，到了十七公尺的深处，就是离开水面不过三公尺的地方，你会发见井旁有一个洞，刚好可容一人蛇行而入。你如果爬进洞去，约四公尺，便可到达另一井；这实在不是井，而是一条垂直的孔道，有木梯可以爬上去，约十公尺便到顶点，此处又有一条横隧道，约长三公尺，一人伛偻可入。隧道尽处为一门，进了门，一架印刷机就跃进你的眼帘。原来这就是“地下印刷所”了。这地下室的大小和它上面的厨房差不多，一架对开的印刷机和四人用的排字架摆在那里，一点也不见拥挤。地下室的四个壁角都有向上开的通气孔，又有小铁炉，在靠近排字架的壁角，这是专为烧毁稿纸和校样用的。铁炉也有烟囱上达地面。地下室和它上边那厨房的地面相隔两公尺厚的泥土。

这就是“地下印刷所”构造的概况。当年进出这地下室只有一条路，就

是上面讲过的那口井。工作的人员和印刷物都从井口进出。现在，为了参观者的方便，在正屋旁边另筑一座螺旋形的铁梯，可以直达地下室的后壁，而在此后壁上又新开一门。参观者不必下井爬行，可以舒舒服服从那道螺旋形铁梯走进地下室了。

一九 三年，斯大林在乔治亚领导革命工作，计划建立这个地下印刷所。先由罗斯托玛乞维列出面购了这块地，并向梯俾利斯市政府工务局领得营造住宅的执照。于是他们雇工先开一地穴。（因为一般居民的住宅都有地窖以贮藏粮食等，造房之前先开地穴，不至于引人怀疑），然而开的太深一点，见了水，只好废止，而在其上再开一地穴，长方形，约宽五步长十步。这时候，作为业主的罗斯托玛乞维列就藉口钱不凑手，停止建筑，将工人都辞去。然后同志们把印刷机拆卸，零零碎碎运入地穴，同时又在地穴的一端开凿了三公尺长的横行隧道，和十公尺长的垂直的孔道（如上文所述）。等到这一切都完成了，就用厚木板封闭了地穴的向上开的口子（约三公尺见方），又在木板上加了二公尺厚的泥土。从地面看，一点也看不出这下面还有一个地下室。此后，另招工人在这地穴上面建筑了厨房和两间正屋，又造披屋，开井，深二十公尺见水。井已完成，即辞退工人，再由同志们自己动手，在深十七公尺处开一横孔，便与地下室来的隧道沟通，于是大功告成。

这个“地下印刷所”设计的巧妙之处即在利用那口真正的水井作为进出的唯一的路。因为水井是家家有的，不至于引起人们怀疑。

一九 四年“地下印刷所”开始工作，一切都很顺利。但为了谨慎起见，又在正屋的左首一间设置了瞭望岗；担任这一个职务的，就是长年坐在窗口做女红的腊却兹·蒲萧列兹。她如果看到院子外的街道上来了可疑的人或宪兵警察，就按一下隐藏在窗下的电铃，“地下印刷所”的人们听到这警铃，就把机器停止。这是因为印刷所虽在地下，但机器转动的声音地面上还是可以觉到。腊却兹·蒲萧列兹一直活到八十多岁，于一九四六年五月故世。

一九 六年，由于斯大林的提议，乔治亚的革命组织内成立了军事组。主持其事者为男女同志各一人。军事组开会地点即在此“地下印刷所”上面的左首那一间正屋内。不料军事组内有叛徒，向沙皇警察告了密。但叛徒实不知此屋之地下尚有印刷所。警察搜查全屋，一无所获。因无所获，警察未封屋亦未捕人。但此屋显然已不复能用。业主罗斯托玛乞维列在门前贴了“召租”的纸条。可是隔了两日，大队宪兵从早到晚搜查了整整一天，仍无所得。但是一个宪兵官长在那口井上看出可疑之处来了。他看见井内壁的窝儿颇为光滑，而且井内壁的上端也颇光洁，他推想必有东西常在此井口进出，故而把内壁及开井时内壁所留的窝儿都磨光了。他用纸放在吊桶内，燃着了纸，把吊桶徐徐放下井去，发见吊桶还没有达到水面的时候，桶内的火光忽向一旁牵引。于是断定了井内必有秘密。召了消防队来下井去查看，始知井内另有隧道通别处。消防队员不敢进隧道，宪兵也不敢进去。但有一事已可断定，即此房及其院子的下面必有地下室。宪兵们根据这一个假定到处探测，结果，在厨房里找到线索，就把那“地下印刷所”发掘出来了。

根据当时的官文书，宪兵们在此“地下印刷所”内除抄获对开印刷机一架外，又获乔治亚，阿尔美尼亚及俄罗斯三种语文的铅字一千余公斤，已印就的小册子及传单八百公斤，白报纸三百二十公斤；此外尚有炸弹，伪造的身份证等等。当时官方呈报上级的报告写了两大厚册，现在尚保存于马恩列斯学院乔治亚分院的史料保管库内。房主罗斯托玛乞维列被捕，充军到西伯

利亚。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后，罗斯托玛乞维列始得自由。“地下印刷所”被破获后，沙皇的宪警把上面的正屋和披屋都放火烧了。一九三七年，苏联政府恢复了此一革命史迹，把沙皇政府当年从这“地下印刷所”抄去的东西都找回来放在原地方。腊却兹·蒲萧列兹并亲手布置厨房内的用具，使与当年一样。

最后，关于那架对开的印刷机，还要补几句话。这架机器是德国货，本为沙皇的乔治亚市长向德国定购的。但不知为什么，机器到后又搁在仓库内了。革命组织内的工人同志从仓库内把这架机器拆卸陆续偷运出来，装在那地下室，并且使它为革命服务了两年之久。

（选自《苏联见闻录》，1948年4月，上海开明书店）

“耐克拉索夫博物馆”

一排四个房间，外加一小间，这就是十九世纪俄国大诗人尼古拉·耐克拉索夫（一八二一——一八七八）住了二十年的屋子；现在，这已经成为俄罗斯古典文学的圣地之一，“参观者留言簿”上题满了各种语文的赞美辞。

“耐克拉索夫博物馆”当然是在苏维埃革命以后成立的。为了要使得那四个房间的装饰布置尽可能不失旧观，苏联学术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们曾经花了很多时间和心血：他们搜罗了许多的旧画，木刻，相片，通讯，回忆，以及其他文件，细心地比较研究，然后方能把这位大诗人生前的寓所的内部陈设大致不差地再建立起来。为了要知道当时墙上糊的花纸是什么图样，曾经很小心地把墙上糊的纸一层一层剥去，盼望能够发见些什么；后来，果然在揭下来的一层纸上发见了一八六七年的《声音》杂志的一小角，而这上面还留存着一种墙纸的花样；这一点线索大大地帮助了恢复旧观的工作。

因为耐克拉索夫是一八五七年搬进这屋子的，直到他逝世，一共住了二十年之久；发见的《声音》杂志的一角既然是一八六七年的，可以猜想这还是耐克拉索夫住在这屋子的时候糊在墙上的，因此亦可以假定那上边残留的墙纸花样大概就是耐克拉索夫家中当时所用的了。

以上所述，在研究耐克拉索夫的生活这范围内，当然是极琐屑不足道的一件事，然而由此亦可见苏联学术界那种凡事都不肯马虎的作风；耐克拉索夫博物馆并不是草率钉一块招牌“敷衍公事”，耐克拉索夫博物馆虽然小，但真能表现了这位大诗人在十九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为了进步的思想而奋斗的精神；不但表现了七十年代的耐克拉索夫，其实也表现了六十到七十年代整个俄罗斯文坛的精神。——“耐克拉索夫博物馆”所陈列的材料就以此为中心。

现在，我们按次序参观这位大诗人的故居。

大门口有一头剥制了的熊。这是耐克拉索夫亲自猎得的。他喜欢打猎，他的用具上多有犬马等雕饰。而这一头剥制的熊，也叫人想起莫斯科托尔斯泰博物馆内那张大熊皮，那也是托翁亲自猎得的。

进门第一间是耐氏生前的会客室。这里陈列着耐克拉索夫早期作品的初版本。墙上挂的，有耐氏一八四三年的画像；这是小幅的水彩画像，若哈洛夫所作。壁角有小型的果戈理的铜像。但是最使人注意的，是和毕林斯基有关的两幅画。一幅是那乌莫夫所作，画的是耐克拉索夫访问毕林斯基请他为《现代人》杂志写稿；那时毕林斯基已经卧病在床。那乌莫夫和耐克拉索夫交往颇久，耐氏多数作品的插图也是那乌莫夫作的。另一幅是毕林斯基逝世时的画像，这是有名的格洛薄莫夫的作品，陈列在此处的，是摹本中最好的一帧。和这画像同在一处的，是毕林斯基病重时的照相。

毕林斯基从一八四六年起，就参加了《现代人》杂志，发表他的精辟的文学批评。使这当时最进步的刊物——《现代人》增加了不少的声誉。他这有力的支持，直到一八四八年他逝世而止。《现代人》杂志是耐克拉索夫生平事业最大的一件，他于一八四七年成为这杂志的主干，而早期的《现代人》又和毕林斯基有密切的关系，得到他有力的支持，所以在这“耐克拉索夫博

耐克拉索夫：通译涅克拉索夫。

毕林斯基：通译别林斯基。

物馆”的第一室（耐氏生前的会客室）陈列了这些材料是有深意的。但是，如果从耐克拉索夫住进这屋子的时间（一八五七年）算起来，离开毕林斯基的逝世已有十年光景了；这时候，《现代人》杂志的台柱子便是契尔尼谢夫斯基和杜布罗留波夫，——继承了毕林斯基传统的民主运动的健将和伟大的前进的思想家。

耐克拉索夫博物馆的第二室就是这位大诗人生前所主办的两大杂志的编辑部。这两大杂志，一个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现代人》，另一个就是《现代人》被禁以后的《祖国纪事》。原来《现代人》最初是大诗人普希金所创办，时在一八三六年。普希金死后，这杂志由勃莱特略夫（一七九二——一八六五）接办。一八四七年，耐克拉索夫负责了《现代人》编辑事务，他就倾其全力使得这杂志成为前进思想和民主运动的坚强堡垒。他那时的日子是在不断的斗争中——和沙皇的检查制度作顽强的斗争。如果说前期的《现代人》的台柱子是毕林斯基，那么，后来代替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文艺批评家而兀立于《现代人》派的进步作家们的班首的，就是契尔尼谢夫斯基。一八六二年，沙皇政府逮捕了契尔尼谢夫斯基，一时恐怖气氛布满俄京，《现代人》杂志不得不暂时休刊。但是由于耐克拉索夫的不断努力与周密计划，停刊八个月后，《现代人》仍以从前那样坚强的姿态和读者见面。可是，压迫愈来愈强，沙皇政府的反动愈来愈疯狂，一八六五年，《现代人》接连两次受到警告；及至次年四月大学生喀拉科索夫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未果，沙皇政府对于前进人士的压迫更严，《现代人》的处境尤其困难。挨到六月就被封禁了。然而耐克拉索夫是不会就此“安分”的；在《现代人》被禁后半年，他又接办了《祖国纪事》杂志。这也是个老杂志，主编人是克拉耶夫斯基，一八三九年创刊。耐克拉索夫接办了这杂志以后，就使它面目一新，所有从前支持《现代人》的进步作家就又集于《祖国纪事》的旗帜下了。

看了上面这一点简单的叙述，就知道“耐克拉索夫博物馆”的第二室——诗人生前主编的《现代人》与《祖国纪事》的编辑部，不但代表了耐氏一生最重要的一段，而且也代表了五十和六十年代沙皇政权最黑暗最反动的时期，团结在《现代人》与《祖国纪事》两杂志之下的民主进步人士是怎样和反动势力作殊死的斗争的。

这“第二室”的布置也帮助我们回忆这些壮烈的史迹。这里有耐克拉索夫生前所用的书桌。壁炉架上有铜钟及两铜马，铜钟上的装饰是一头猎犬。耐氏喜欢打猎，所以他室内的摆设大都是和狩猎有关的犬马之类。

这里另有一桌，不可不特别指出。原来这平常的桌子便是契尔尼谢夫斯基被捕以前常用的；契氏那时常到这编辑部来，且常常在这书桌前面立着写字。

“博物馆”的第三室是耐氏生前的餐室。这是长方形的，比较前二室都大些。房间的两角各有一大壁炉（俄国式的），其中之一外边砌着镂花赭色琉璃砖。壁上挂的有克朗莫斯考哀所作的耐氏大油画像；这是耐氏晚年画像最有名的一幅。此外，又有耐氏照片多张。

第四室为耐氏生前的卧室，耐氏即死于此室，若干遗物都陈列在一只玻璃橱中。这中间有耐氏生前所用的表及墨水瓶，又有带着银链子的圆形银牌，

契尔尼谢夫斯基：通译车尔尼雪夫斯基。

杜布罗留波夫：通译杜勃罗留波夫。

这是俄国农民公赠与耐氏的，牌上刻着一行字：“农民的保护者”。耐氏的作品主要是声诉了俄国农民的痛苦和要求，“农民保护者”的称号他实受之无愧。

这里也有耐氏友人的遗物。一是毕林斯基生前所用的木质笔架。又一是契尔尼谢夫斯基所用的笔及契氏的一绺头发。按契氏于一八六二年被捕后，先囚禁于俄京（圣彼得堡）之彼得和保罗炮台，两年后（即一八六四年）被判七年徒刑，流徙于西伯利亚东部矿区；满刑后又被秘密迁禁于雅库吉亚。他差不多过了二十年的流徙生活，一八八九年十月逝世。他后死于耐氏约十年。猜想起来，保存在耐氏手上的契氏的一绺头发也许是契氏充军到西伯利亚的时候送给耐氏的。

耐氏的遗嘱也陈列在第四室，这遗嘱是给他夫人的。遗嘱上感谢夫人对他事业之帮助，并请她保藏他的原稿和书籍。耐氏卧病两年而后逝世，这张遗嘱是由夫人笔录的。

最后，第五室，原来是仆人住的房间，现在却陈列着耐氏作品中的插画；其中有不少版本现在已成孤本。

耐克拉索夫晚年得了不治之症，他最后的两年完全消磨于病榻。痊愈既已无望，他只有等待死神快来，然而那时候他偶然作了几首小诗，对于未来的祖国的新希望仍然是充满了信心的。例如那四行的短诗《倦极了，倦极了》。这四行是：

倦极了，倦极了……应该是我长眠的时候啦！

哦，罗斯！我知道：你是不幸的；

但你还照明了我走过的路径，

让我向更美好的地方前进一步。

（用戈宝权译文，“罗斯”是俄罗斯的古名）。

而且斗争的热情也依然在他心中燃烧。在他给他夫人静娜的一首诗中，他说：

斗争妨碍我成为一个诗人，

诗歌妨碍我成为一个战士。

谁要是为世纪的伟大目标服务，

就应该把他全部的生命，

献给为了人的兄弟的斗争，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万世永生……

然而事实上，诗人耐克拉索夫既未妨碍其为战士，而战士的耐克拉索夫亦未妨碍其为诗人。在主编《现代人》与《祖国纪事》的漫长岁月中，耐氏的诗作固然减少了，但是诗人的火热似的作品却久已振奋了人心。耐氏是诗人但也是战士，久成定论。这，只看他病中如何引起广大人民的热烈慰问，他死后来参加葬仪的“差不多是整个俄国的革命的参谋部”，就可以知道他的数十年奋斗生活已经有了怎样的影响了。

1947年10月4日

（选自《苏联见闻录》，1948年4月，上海开明书店版）